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3 年 11 月 30 日第 26 期（增刊）

## 本期目录

### 史林一叶

朗 钧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及其在“林彪事件”中的变异

舒 声 北大文革中的“异端”组织与人物

舒 声 北大与清华文革异同之比较

### 书海泛舟

丛璋、亚达、国真 《燕园风云录》第二集：前言与目录

### 故纸堆

乔兼武、杜文革 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 编读往来

晓星谈陆小宝文

---

【史林一叶】

##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 及其在“林彪事件”中的变异

朗 钧

赫鲁晓夫对人类政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个可以准确定义斯大林主义核心内容，并可准确评估斯大林时代的负面政治学名词——“个人崇拜”。斯大林死后不到三年，苏共就毫不留情地清算了斯大林时代因“个人崇拜”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良心未泯的举动立刻被全世界的理性社会所认可。

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苏共“二十大”对于毛泽东的刺激效应在毛的心中形成了一个“二十大情结”，这个情结支配了他晚年整整 20 年的生命（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载李慎之、何家栋著《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一版，352 页）。此情结暗藏于“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七千人大会”、“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中，

历经十五年的纠结与再纠结，竟然在“林彪事件”中荒谬绝伦地变异和蜕化。

林彪违抗历史潮流，顶风作案，从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林反目后，林彪被毛泽东逼入绝境，毛所用的手段就是反对“个人崇拜”。林彪及其团伙的覆灭固然与毛泽东魔道之精湛诡异有关，但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林彪本人殚精竭虑制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崇拜”的理论有悖人类政治学的基本常识，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成——历史唯物主义。

本文将对毛、林在“个人崇拜”的博弈中的失与得做一个提纲挈领的简单讨论。由于李慎之先生所谓的“二十大情结”可能会造成误读，所以本文使用时一律改为“个人崇拜情结”。

## 一、从毛泽东的“小手指”谈起

1964 年 12 月 15 日至 1965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四清）运动工作会议。在会上，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的合理性，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争论，毛、刘之间的矛盾首次公开化。多少年后，薄一波和安子文告诉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7 月第一版，第 118 页）

毛泽东关于“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的说法，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曾经揭露的斯大林的一段与“小手指”有关的说法颇为相似：

赫鲁晓夫有一次从基辅来到莫斯科觐见斯大林。斯大林把不久前写给铁托的信件抄本给赫鲁晓夫看并问：“你看过吗？”没有等赫鲁晓夫回答，斯大林就说：“只要我动一下小手指，铁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

赫鲁晓夫评论说：“‘动一下小手指’这种说法表现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但斯大林确是这样做的。他动一下小手指，搞掉了柯秀尔，再动一下小手指，波斯蒂舍夫、邱巴尔没有了，再动一下小手指，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许多人也消灭了”（柯秀尔，苏联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统治时期柯秀尔受尽严刑拷打，被处决；波斯蒂舍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斯大林枪毙；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邱巴尔，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 年被捕，1939 年被处决；沃兹涅先斯基，苏联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政治局委员，苏联科学院院士，1950 年被捕并被处决；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苏共中央书记，曾任列宁格勒州委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49 年因“列宁格勒案件”而被迫害致死）。

对斯大林而言，“个人崇拜”的本质就是“权力崇拜”，就是“绝对权力崇拜”。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反感起源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此，以毛一贯具有的阅读习惯和对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一定认真阅读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多年后有意模仿斯大林的“小指头”

之说，表明毛泽东对斯大林曾经享有过的不受任何约束之权力的心仪神往。在效仿的实践中也确是如此，毛动一下小手指，搞掉了彭德怀，再动一下小手指，刘少奇没有了，又动一下小手指，贺龙、陶铸和许多人也消灭了。

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不仅是对斯大林的清算，也是在提示中国人应该对本国正在形成并有迹象演变成更加非理性的“个人崇拜”有所警惕。但是，历史还是无可阻抑地把中国拖入了“个人崇拜”的深渊。中国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完全是苏联“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重演。

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最严重后果是逮捕和屠杀党的干部。曾经参加过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逮捕的竟有1108人；

苏共“十七大”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含候补委员）中，就有98人被逮捕或遭到枪决，占总委员人数的70%。18名政治局委员（含候补委员）中，基洛夫被暗杀；奥尔忠尼启则被迫自杀；科西奥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夫、埃赫等5人被处决。

当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宣布上述“1108”和“98”这两个数字时，苏共“二十大”会场上群情激愤。

中国的情况极其类似。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两级的清洗也十分严重。

中共“八大”选出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中央委员（含候补中央委员）170人。这170名委员仅有53人被选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仅占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31%（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写道：“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继续当选的只有53人，占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9%，占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29%”。29%这个数字不确，应该是31%）。其余69%的委员中的绝大多数被清洗。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长期关押在秦城监狱和各地的监狱中。

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含候补委员）共23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13人遭到清洗，他们是：刘少奇、彭真、彭德怀、贺龙、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邓小平、张闻天、陈毅、李富春。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区别仅仅在于：毛泽东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在党内高层大开杀戒。

但是，民间的情况就不大不一样了。文革中，仅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第二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为据，以“恶毒攻击”罪逮捕、判刑和枪毙的，全国就有10万人之多（穆青《历史的审判》，载1981年1月28日《人民日报》，收入《历史的审判》一书）。林昭、王佩英、张志新等人都是以“恶攻”罪被枪毙的。石仁祥、朱守忠、舒赛、郭维彬、朱希都是因攻击林彪罪被判判处死刑的（石仁祥：安徽省和县人。1968年4月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和县水利局工作。“九大”前夕写了《致党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并自己刻版、油印7份，于1968年

12月26日寄给党中央，同时发往武汉军区、济南军区以及南京、西藏的空军领导机关。信中说：“林彪做的坏事愈多，失败愈惨！”1969年1月8日被逮捕入狱，因为拒绝放弃反对林彪的观点，1970年7月12日，这位年仅29岁的年轻人被以“罪恶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等罪名惨遭杀害。临刑前他说：“你们可以杀我，但若干年后，会证明我是对的！”朱守忠：194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1958年在宁夏曾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在单位里谈到“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共‘九大’党章，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1969年11月因上述言论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宁夏被枪决。舒赛：女，1917年生于湖北江陵。1966年12月4日化名“王咏”在北京的闹市和重要机关门前贴出了18张反对林彪的大字报，成为文革时期第一个公开反对林彪的人。同年12月7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9年作为重要政治犯被押出北京，关进山西临汾第三监狱。1971年5月19日含冤死于狱中。郭维彬：女。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局图书馆管理员。1967年8月18日写了题为《到底谁错了》的文章，认为文化大革命犯了方向性错误；中央文革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彪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而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当天被逮捕。在狱中，高喊“打倒林彪”、“把江青从中央赶出去”等口号。曾于1969年报判死刑执行，但后来未执行而长期关押。朱希：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批评林彪，成“现行反革命”，受尽拷打折磨，判处死刑。关于石仁祥、朱守忠、舒赛、郭维彬、朱希的文字摘录于共识网《林彪研究：给政治结论下注脚还是研究历史？》。

“个人崇拜”在中国的持续升温是发生文革灾难最重要的原因。为了防止文革在中国的重演，清算“个人崇拜”及其在中国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显得十分必要。

## 二、毛泽东“个人崇拜情结”的构成

“个人崇拜”是一种类宗教或伪宗教现象，它的本质就是神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凌驾于国家的法律和执政党的党纪之上，任其有所欲为。由于“个人崇拜”在理论和实践上显然有悖于东西方普适价值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奴隶史观，使得整个国际共运阵营中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正面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做法进行辩护，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本人。

1956年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共的宣传机构在媒体上公开强调要加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不能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党和党中央之上，说到底就是要对个人的权力强度和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定。

新华社内参大量登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感到震惊和不解，有人还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

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份，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

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

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发致敬电，不给党中央发致敬电。更有的人提议“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沈志华《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见人民网）。

面对国内外的政治压力，毛泽东只能屈就，其直接表现就是不得不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五个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中均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但是，“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绝对没有抵制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主旨（沈志华《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此后，不要阻碍“个人崇拜”在中国的出现，也不要因“个人崇拜”在中国的出现而被后人指责——这就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最本质的内容。

依据时间顺序，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的表达之侧重是不一样的，可细分为前期的“斯大林情结”和后期的“赫鲁晓夫情结”。前者侧重于自身价值的肯定性评价，而后者则是惟恐自身价值被质疑、被否定的疑虑。

### 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及其展现

所谓的“斯大林情结”，从语言的表达上是要坚持“正确、全面地评价斯大林”，但其本质是要维护产生“个人崇拜”现象的制度。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说到底，就是要确保毛之生前身后都不受到谴责的大前提下，保全斯大林时代所有“个人崇拜”的形式和内容，并将其进一步中国化。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经验》）、《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和《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简称《关于斯大林问题》）是中苏论战中涉及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三篇重头文章，且均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定稿。这些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重要文字是毛泽东心存“斯大林情结”的历史见证，很值得重新阅读和重新认识。

1956年4月5日，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发表由陈伯达执笔（崔奇《我所经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第12页）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由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先没有向中国党通报，毛只好违心地仓促表态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传 1949-1876 上》，第498页）。《经验》承认“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等等。这是中共（实际上是毛泽东）在中苏论战中唯一的一次对“个人崇拜”现象的批判性评述，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个人崇拜”现象的直面评述。

但是，《经验》还是用隐晦的词语为斯大林进行了辩护：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

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会懂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列宁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的论述根本不在一个理论层级上。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体系。而列宁的“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说仅仅是一种关于革命组织框架结构的叙述，并无理论价值。更何况赫鲁晓夫也从来没有反对过列宁的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说。

1956年12月29日，中共发表由毛泽东指导，胡乔木等人执笔（崔奇《我所经历的中苏大论战》，第28页）的《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长文。此文从前一篇文章《经验》的立场上大踏步后退。

苏共二十大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并没有对产生“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究其根源。赫鲁晓夫甚至说：“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

同年11月11日，铁托在海滨城市普拉，向伊斯特里亚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发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讲。铁托在演讲中说，赫鲁晓夫虽然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铁托还说：“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各国党内设法继续保持他们的职位，他们再一次希望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的人民的头上，甚至别国人民的头上。”铁托甚至呼吁把各国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铁托的演讲在国际社会中掀起轩然大波，也引起了中共和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再论》针对铁托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是使其得以产生的制度的观点，强调说：“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在为产生“个人崇拜”现象的制度进行辩护。

最值得注意的是，《再论》全文共两万多字，但从头至尾竟然没有出现“个人崇拜”这个字眼。曾经在《经验》文中出现过的正面批判“个人崇拜”的论述和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表述也随之统统消失。

《再论》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的这种变化，与6月爆发的波兹南事件和10月份爆发的匈牙利事件有关，也和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有关。是毛泽东心存的“斯大林情结”最突出的表现。

1956年10月，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夫时说，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指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



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第 98 页）。

毛泽东在此对“个人崇拜”做出了一个界定，即“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是应该反对的；而正确的“个人崇拜”则不应该被反对。但是什么是毛泽东心中的正确的“个人崇拜”呢？面对外国大使，毛泽东不便给出明确的说法。（左图：斯大林时代的宣传画）



进入 60 年代后，中苏关系开始全面恶化。

1963 年的 9 月 13 日，中共发表“九评”的第二篇：《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中将“个人崇拜”一词置换成“个人迷信”。

毛泽东对《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有多处修改和补充。毛在文章中两次写到，世界人民或苏联人民“越来越怀念斯大林”（《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286-1287 页。毛泽东修改《关于斯大林问题》时加写了“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等文字）。在苏联或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底有多少人“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毛泽东及其外交部和中联部曾经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和统计。毛泽东所说苏联人民或世界人民“越来越怀念斯大林”，是一个无据判断，除了展现一下自己的“斯大林情结”以外，什么都说明不了。（右图：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画）



《关于斯大林问题》在面对“个人迷信”问题时，选用否定之否定的语气表明中方（实际上是毛泽东）的立场，其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不仅如此，文章中 18 次出现“反对个人迷信”这个词组时，均在此词组前冠以“所谓”二字，即“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很显然，《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口气虽然强硬，但是，仍然不敢直面评述“个人崇拜”本身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文章是借“所谓”二字回避了对“个人崇拜”本身的直面评价。

到底是反对还是赞成“个人崇拜”呢？尽管毛泽东在公开场合不予表态。但是，在党内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给出了一套新奇的说法：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是崇拜真理，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对不正确的部分也赞成，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08-125页。）。

毛泽东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毛所说的正确的“个人崇拜”，归根结底仍然是崇拜真理，而不是崇拜个人！对“个人崇拜”做“正确”和“错误”之区分无异于对“种姓歧视”做“正确”和“错误”之区分一样荒谬。毛关于“个人崇拜”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说法，在他一言堂的党内会议上说一说还可以，但是，绝上不了中苏论战的纸面。

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终于袒露了心声：

“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指王明）。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当有人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时，毛泽东当即反驳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林蕴晖《毛泽东1958年压制反对声音：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见南报网<http://www.njdaily.cn/2012/0730/197130.shtml>）

当然，这种赤裸裸地赞成“个人崇拜”的言论更是上不了中苏论战的纸面的。

自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闭幕，直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中共与苏共的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在论战中，凡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如何对待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和平共处”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全民党”“全民国家”问题时，中共的表述都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但是，唯独在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辩论中，中共（实际上是毛）的正式公开的表述均是闪烁其辞，避重就轻的。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直接评价“个人崇拜（迷信）”这四个字，说明毛充分意识到“个人崇拜”在世界政治学领域中的负面的价值定位。

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之前心怀“斯大林情结”是与他尚未遭遇经济建设的大失败有关。毛或许认为，在他的领导下，超英赶美的伟业一旦实现，在中国，就不会有人再质疑“个人崇拜”的合理性了！

但是，中国经济“大跃进”的奇迹并没有发生。被只善于破坏旧世界而不善于建设新世界的毛泽东鼓噪起来的“大跃进”之直接后果就是连续三年的大饥荒，饿死饥民三千万！

国民经济即将出现大崩溃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信指责毛泽东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根本原因；国民经济已经出现大崩溃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



上不再重复三年前在庐山上所说的话：“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而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毛泽东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在党内，尤其是在党内的高层，自己已经处在不那么被“崇拜”的境地了。于是，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开始悄然转化为“赫鲁晓夫情结”。

### 毛泽东的“赫鲁晓夫情结”及其展现

《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另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完成了对赫鲁晓夫的政治素描。文章通过列举和对照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咒骂斯大林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发表的吹捧斯大林的讲话，成功地将赫鲁晓夫描绘成一个自食其言的伪君子。

《关于斯大林问题》是毛泽东心怀“斯大林情结”的代表作，也是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向“赫鲁晓夫情结”转换的代表作。

所谓“赫鲁晓夫情结”，是一种不自信和恐慌的情结。此情结产生于毛泽东对那三千万饿殍之冤魂的恐惧。为什么文革中刘少奇会被指控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因为刘少奇当面对毛泽东说了：“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90页）

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某外国党代表团时又说：

“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原定会议议程是讨论社教（四清）问题 and 三线建设问题。

6月8日，在会议召开20多天后，毛泽东开始说话，他说话的重点放在防止出修正主义和培养接班人问题上。毛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的手里。刘少奇针对毛的发言说：“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争锋相对地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6月17日，毛再做重要讲话，对“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必要性及其五项基本条件进行了全面论述。

7月14日，撰写“九评”的反修小组将毛讲话中关于“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点内容全部写入“九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毛泽东提出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的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员予以提及。足见毛泽东对“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所持有的警惕和戒备。（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是：①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②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

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③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④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⑤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决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可以这样判断：“赫鲁晓夫情结”在毛泽东心中的成型期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刻。

毛泽东以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为总前提，将培养基层领导干部的接班人、中央一级领导层的接班人、以至培养毛自己的接班人统统囊括其中。这种做法在反修防修理论的恢宏叙述中显得如此之合情合理和不容置疑。但是，刘少奇原有的接班人地位就显而易见地被放到了一个至少需要重新认定的位置上了。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四清）运动的工作会议。在会上，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的合理性，毛、刘发生争论。如前文所说，当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时，刘少奇被打倒的命运就被注定了。但是，文革的发动，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从清洗罗瑞卿、杨尚昆到打倒彭真、陆定一；从转发“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到亲笔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所花费的精力岂止是“动一个小指头”，用“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来形容一点都不过份。

毛泽东假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之名义，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批判，恰恰是毛泽东心存“赫鲁晓夫情结”的最好的见证。

### 三、刘少奇、林彪，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心中的“赫鲁晓夫情结”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将赫鲁晓夫式的涉嫌人物统统从中共党的高层内清除出去。而辨别和认定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最为重要的。

1966年5月，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上写到：“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文革伊始，人们只把这句话视为泛泛之言，并没有意识到毛之所言，确有所指。一年后，戚本禹发表题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文中不指名地对刘少奇恶狠狠地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人们这才意识到“中国的

赫鲁晓夫”原来是指刘少奇。

当年，当人们意识到“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时，已感惊恐。但是四十七年后回过头来看，毛的这段用赫鲁晓夫做比喻的文字到底是在说刘少奇还是在说林彪？当群众还没有从刘少奇即将被打倒的惊恐中走出来的时候，毛泽东的关注重心已经开始转移。校正这个表达与理解上的时间差对于正确解读毛文本是极为重要的。

对毛泽东而言，那时的刘少奇正处在“已被我们识破了”状态中，而“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一句中的“正在”二字则清晰地表明，毛泽东的这句话分明是在说林彪！因为林彪“正在受到我们（毛泽东）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1966年6月毛泽东在与胡志明的谈话中进一步表明了毛的上述警惕。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散木《1966年毛泽东与胡志明在杭州的一次谈话》，《党史博览》2012年08期）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一直被史学界认定为是在念“政变经”。其实，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除了念“政变经”，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吹捧毛泽东及其思想，林彪说：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以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7月8日，毛泽东写了《给江青的一封信》，谈及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史学界一直认为毛的这封信是指责林彪在念“政变经”。如果我们认真阅读毛《给江青的一封信》就会发现，对于林彪“五一八”讲话中与政变有关的内容，毛泽东只讲了一句很中性的话，即“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而在涉及林彪大肆吹捧自己的话语时，毛泽东的评述文字的数量陡增，毛说：

“他（指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

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毛泽东的上述文字包含了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毛表示对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的崇拜之言不安。毛表白，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一生中还是第一次。

第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毛泽东在自谦。但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之句的引用却很费解，“竖子”二字，毛到底是在说自己，还是在说林彪？

第三、毛意识到“个人崇拜”的搞法一定会“走向反面”，是要跌得粉碎的。但是，历史证明跌得粉碎的是林彪，而不是毛泽东。

显然，毛泽东棋看八步，未雨绸缪，留下上述文字，与林彪的阿谀吹捧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是为了拒绝“个人崇拜”，而是为将来推卸在中国大搞“个人崇拜”的历史责任——这就是毛泽东给江青写此信的深谋远虑。

由于斯大林模式的“个人崇拜”在全世界和国际共运中已经被赫鲁晓夫搞得臭不可闻，所以，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狂潮即将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有意地保持着某种矜持。他既要享受那种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又要顾及将来不要落得像斯大林那样身后被唾骂的下场。在适当的时候主动逃离“个人崇拜”的热场是毛的狡黠之处。

8月，林彪在刚刚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跨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被特誉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但是，就在这时，毛泽东却向林彪送去了《范晔传》。

范晔，《后汉书》的作者。因卷入彭城王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之争，元嘉二十二年被杀。

范晔之才，国士无双。狂衅覆灭，岂复可言（范晔狱中所写《狱中与诸甥侄书》开篇之句：“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林彪文采与范晔怎堪相比？毛泽东绝不会指望林彪能够写出一部《后汉书》那样的作品。毛泽东让林彪看《范晔传》，看的就是“狂衅覆灭”这四个字。毛泽东是在明示林彪千万不要重蹈了范晔狂衅覆灭之复辙。

只有把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6月的“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讲话”、7月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8月的毛泽东推荐给林彪的《范晔传》放在一起读，方可读懂毛泽东瞻前顾后之用心。

让林彪最终为即将在中国出现的“个人崇拜”狂潮负责！这是毛泽东在文革启动时段就已经设想好的结局。至于林彪将来将会以何种形式为“个人崇拜”运动在中国的出现负责，负责到何等程度，则要看事态的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控制过程，其控制权完全把握在毛的手中。

毛泽东是玩政治的斯诺克高手。击打彩球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的白球到达一个最佳位置，便于有效地发动下一轮进攻。

#### 四、毛泽东用反对“个人崇拜”将林彪逼入绝境

20 多年来，林彪辩护者书写的为林彪喊冤叫屈的文字已累计超过千万字。但是林彪辩护者始终没有说清楚毛泽东是怎样将林彪逼入绝境的。本节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是渴望的。但是毛不可能自吹自擂。毛需要有人站出来担当起“个人崇拜”吹鼓手的角色。这邪恶的历史性重任就落在了林彪的肩上。

在紧接着中共“八大”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中未获全票。毛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华飞《九一三林彪之死令毛泽东的形象全毁颜面尽失》，见中华网）。这是毛泽东向林彪发出的第一声召唤。有了毛泽东的这一声召唤，在两年后的 1958 年 5 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跨越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林彪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后，立即大张旗鼓地谈论被中共“八大”全部政治文件删除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在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林彪发言说：“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就是军事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军事方面创造性的发展，我们要好好学习。”林彪强调说：“学习政治，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林蕴晖《毛泽东 1958 年压制反对声音：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林彪在中共“八大”后重提“毛泽东思想”，隆重地回报了毛泽东。

林彪选择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与毛泽东互动是自觉自愿的。林彪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后，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两次众所周知的极致表演分别发生在 1959 的庐山会议上和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因众所周知，这里不再多讲。

林彪企图通过对毛的吹捧和阿谀“得一人而得天下”的政治图谋始于 50 年代后期，发展于 60 年代中期，是与中苏论战同步进行的。然而，林彪对毛肆无忌惮漫无边际的吹捧充分地表明，中苏论战中中方（实际上是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表达中的微妙之处和难言之隐对林彪的提示作用几乎等于零。林彪一意孤行在中国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表明了林彪思维的封闭性，而这种封闭性思维与普适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文革爆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被推向新的高度。认真回顾文革历史，

红卫兵和造反派似乎对“个人崇拜”的贡献并不很大，无论是北京的卜大华、彭小蒙、王大宾、蒯大富还是上海的潘国平、王洪文、陈阿大；中央层级的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甚至江青都没有太过份的“个人崇拜”的言论和作为。

文革中，对毛的“个人崇拜”从形式到内容的不断升级和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军队。对刘英俊、蔡永祥、李文忠、门合等军人的过度宣传超越了这些人的人道主义行为的基本事实，生硬地将他们的人道主义的献身行为和学习毛的著作以及紧跟毛的革命路线联系在一起（当时大肆宣传了李文忠的“豪言壮语”：“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门合的“豪言壮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林彪在文革中的重要作为就是以军队为阵地，不断地寻找和推出“个人崇拜”的英雄和典范，为已经非常狂热的“个人崇拜”继续加温加热。

就毛泽东而言，由林彪殚精竭虑地鼓噪煽动起来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文革阶段，其荒诞程度从内容到形式已经远远超越了国际共运所谓的“个人崇拜”之常态，没有丝毫的庄严性可言，用“个人迷信”来描述似乎更加贴切。忠字舞、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铸毛章塑毛像这些劳民伤财的宗教仪式耗散了民财国力；邪教式的主教崇拜也损害了毛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毛已意识到，作为政治斗争武器的“个人崇拜”，在刘少奇被打倒已成定局后必须降温了。

1966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全部删去。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日，毛泽东删除了新闻稿中“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词。

给“个人崇拜”降温势必要涉及林彪吹捧的话语，但是未必一定导致毛、林关系的急剧恶化。定稿“九大”新党章时，毛泽东虽然删除了林彪吹捧自己“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但同时又拍板认可将林彪接班人的名份正式写进“九大”新党章。这说明毛完全可以把控住为“个人崇拜”降温与照顾林彪颜面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面临政敌的挑战总是被最坏的结局判断所引导——这是长期经历血腥的暴力革命和残酷的党内斗争后，留在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的一种通病。因此，在面临每一个挑战时，毛一旦出手就决不会给对手留下还手的余地。

“九大选举风波”（《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44页）和“李必达事件”（《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83-85页）结束了毛、林的蜜月期。

毛、林交恶后，毛泽东没有像以往那样组织秀才班子书写批判文章，舆论先



行。因为林彪阿谀奉承的话语是和他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纠缠在一起的，很难予以剥离和筛分。对林彪政治资源的剥夺不易使用写大批判文章的形式。而且也没有人敢于承担这种风险。一旦批判起来有投鼠忌器之忧。

毛、林反目后，毛泽东作出的第一个反馈就是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不仅如此，毛还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东西都没有了”（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75页注释34：周恩来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的谈话，1972年12月19日）。如果说，毛泽东的“王八蛋之骂”还是有些闪烁其辞，略有玩笑的成份，其所要表达的意向还不够十分明朗，林彪尚可以装傻充愣，假装听不懂的话，那么毛泽东在下令摘下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语录牌时，对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所说的话就足够明确了：“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毛泽东还对工作人员说：“‘四个伟大’，讨厌！”（《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558页）这一声“讨厌”，后来被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多次重复，其中包括同西哈努克的谈话和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当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时，毛泽东已经将为“个人崇拜”降温和对林彪的政治资本进行剥夺这两件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举轻若重的一招，更是釜底抽薪、枯水竭鱼的一招。

1970年3月，毛泽东建议在拟定的新宪法草案中废除国家主席的章节，用叶群或吴法宪的话讲，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4月25日毛泽东携张春桥亲赴苏州“拜访”林彪，并提出让张春桥接班的建议，明确传达让林彪“歇菜”的信息。

8月13日，在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上，张春桥以“九大”党章为据，提出将宪法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和“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统统删掉。为了激化矛盾，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连赫鲁晓夫都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吴法宪虽笨，但已意识到，张春桥的话锋已经指向林彪。吴法宪不知深浅，扯着脖子和张春桥大吵。

张春桥为什么要说这句看似四六不靠的话呢？43年过去了，林彪“死党”和林彪辩护者对张春桥的这句话的解读均不得要领。

张春桥的这句话来源于《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原文为：“他们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张春桥敢于在公开场合援引此话放肆地影射林彪，毫无疑问是受到了毛泽东的点拨和授意。

张春桥的说法是在挑战林彪的政治底线。而这一点是吴法宪这样的粗人听不懂也想不明白的。因为此人是否认真阅读过“九大”新党章，是否读过《关于斯大林问题》，都很值得怀疑。

“刘项原来不读书”，是因为刘项身边有读书人范曾和萧何。林彪原来不读

书，是因为他身边只有吴法宪这类连中共中央的文件和经典文献都懒得读的人。毛、林交恶的人文背景，说到底是一群读书人对一群不读书人的欺凌。常识、信息、理论的不对称，使毛泽东将林彪一伙玩于股掌之中。作为读书人，毛这样做确实有点不厚道。至于号称理论家的陈伯达为什么也会露出“先验论”的破绽，估计是与老夫子对政治力量对比做出的误判有关。

1970年庐山会议上，针对林彪坚持要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做法，毛泽东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此时的毛泽东俨然一个专职的政治课教员，向无知的林彪讲解马克思主义的ABC。其ABC之一就是当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时的理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当毛泽东向林彪发问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时候，他似乎已分身为此彼两个毛泽东。此毛泽东变成了大反“个人崇拜”的中国的赫鲁晓夫，而被质问的对象则是林彪和那个被林彪无度吹捧的彼毛泽东，一个被斯大林附了体的毛泽东，僵硬的偶像，虚无的图腾。至于文中的“我同林彪同志……”之句，只是毛泽东出于政治斗争的策略需要写下的一句废话。

下庐山后，毛泽东意犹未尽，又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216页）

毛泽东语锋所向就是“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只提倡读毛主席著作和只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林彪！

往日“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毛泽东的笔下已经变成了一个“骗子”。

有了毛泽东的这两段文字，林彪自1958年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后说过的全部吹捧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言论，就被毛泽东轻而易举地置于政治和理论上均不正确的境地。林彪的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也随之被剥夺殆尽。在毛泽东“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追问声中，林彪已沦为思想的乞丐，双手空空、一无所有，所有的政治资源都归零了。

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甩石头”、“掺沙子”、“南巡讲话”等等只是一些旁敲侧击之举。毛泽东反对林彪对自己搞“个人崇拜”才是置林彪于死地的绝杀。此绝杀展现了毛泽东魔道之精湛诡异。毛泽东以反对“个人崇拜”为手段将林彪逼入绝境，无论是否外逃，无论外逃是否成功，林彪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宣告结束。

“个人崇拜”之于毛泽东和林彪同如一面风月鉴。不同的是，毛泽东用过之

后将其打碎了；林彪却相反，入镜后，明知有害，却不愿返身。

## 五、毛泽东如何走出“九一三”的困境

“九一三事件”是一把双刃剑。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毛泽东遭遇“九一三事件”后，心情很不好，影响了健康和寿命。据说毛为此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后来又大病一场，甚至在翌年初还曾休克过一次，虽然被抢救过来，身体却从此垮了，心态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散木《“九一三”事件激发出的政治诗词》）。

林彪辩护者们也非常热衷于这种说法。他们宁肯相信林彪用自己的死亡重伤了毛泽东的身心。如此一来，林彪的死亡似乎就变得非常有意义了。林彪辩护者还认为“九一三事件”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载何清涟主编《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博大出版社，2004年10月）。更有甚之，据说林彪所乘256三叉戟也是被有意放行的，至少李作鹏是这样认为的（《李作鹏回忆录 下》，第792页）。按照林彪辩护者的逻辑，如果毛泽东在整个“九一三事件”中是做局者，甚至连林彪从晃动的悬梯上爬上256专机都是阴谋的构成，那么，林彪的温都尔汗之死应该是一个预设阴谋的圆满结局。既然如此，毛泽东就不应该感到沮丧。

毛、林分手已成定局。如何分手是毛泽东需要斟酌的。“抛石头”和南巡讲话都是在为打倒林彪做舆论准备。毛深知只以散布“唯心主义先验论”问罪“接班人”是不足以置林彪于死地的。毛泽东需要有一个更为强硬的，毋庸置疑的理由用以废黜林彪“接班人”的位置。

突发的“九一三”结局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林彪“一耳罐子——抡了”的疯狂选择确实让毛泽东有些措手不及。但是，林彪的叛逃和死亡令半死不活的“林彪事件”戛然而止，对毛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难道还有比“叛国投敌”更合适的罪名可用来宣告林彪的政治死刑吗？

“林彪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的心情？是一件很值得讨论的事情。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高层出现过一个吟诗热。董必武、叶剑英等均吟诗抒情。毛泽东也不例外。有几首古诗当年曾在坊间流传，据说都和毛泽东有关。

其中一首是白居易的七律《放言》诗。诗中“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一句似乎是毛在自嘲：林彪自1928年上井冈山到1971年摔死温都尔汗跨时43年，试玉也罢，试石也罢，辨材也罢，辨柴也罢，居然没有看清楚林彪的为人和秉性！但是，“王莽谦恭未篡时”、“一生真伪复谁知”之句却可以用来针砭林彪及其“九一三事件”。

还有一首是杜甫《咏怀古迹》。毛泽东将原句中的“明妃”二字改为“林彪”：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林彪死，毛泽东吟诗，说明毛的心情不是像有些回忆录中讲的那样特别糟糕。据实而析，“九一三事件”带来的不愉快在毛心中没有滞留很长的时间。

“九一三事件”后42天，即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失去了20多年的席位得以恢复。

尽管美国在联大上坚持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然而，正是基辛格1971年7月的秘密访华，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翌年访问中国这一举措，助推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实现。

毛泽东闻讯兴奋不已。他断然否决了周恩来不派代表团去联合国的建议。亲自指定乔冠华、熊向晖组团前往纽约。毛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我都没有想到。”

11月8日晚8时，毛泽东再次召见周恩来、姬鹏飞、符浩、熊向晖等人。外交部官员邹一民曾撰文介绍毛泽东接见的情况：毛泽东对周总理说，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毛泽东谈兴很浓，一直谈到下半夜（邹一民《1971年10月毛主席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见360图书馆）。

从上述描述判断，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并不很差，否则不可能从晚上8点一直谈话到下半夜。曾经做过中国驻西德大使的王殊也有类似回忆。他在1972年和毛泽东有过的一次谈话，“毛主席精神爽朗，洋洋洒洒竟纵论国内外大事3个多小时。”（胡中乐《王殊力主与西德建交 毛主席亲自召见并赞扬》，见中国新闻网）

外交解内困之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之时，毛泽东就基本走出“九一三事件”的困境了。

对毛泽东而言，令其彻底走出“九一三事件”的困境是翌年早春美国总统的首次访华。

与“林彪事件”同步进行的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中美总理级密谈”没有因“九一三事件”的出现而停止。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北京会面如期而至。

毛泽东和尼克松心照不宣，以只谈哲学问题为由避谈了敏感的政治话题。但是，毛、尼谈话中并没有谈及任何哲学话题，无论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还是皮尔士的实用主义。谈话一开始就被毛泽东引导到对自身及其著作的评价的话题上。

尼克松说：“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基辛格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我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从毛、尼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没有像一年多前和斯诺谈话时那样强调“总要有个人崇拜”，而是完全告别“个人崇拜”，彻底放下了身段，向西方世

界的领袖人物一躬到底。毛泽东看似谦卑的表述还是有点哲学背景的，这个哲学背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起就映衬在他全部的政治思维的本底上。当毛泽东说自己只“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时，一个哲学话题似乎暗藏其中：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奴隶创造的。有了这样一个表述，毛泽东就找到了毛思想和西方普适价值对接的啮合点。而这个啮合点源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其原本就产生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阿谀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外交辞令，也可以被理解成对毛人格和思想的认同。

与尼克松的会谈对于毛泽东的重要性至少有三：首先，与美国人牵手可以抗衡苏联，制止来自苏联的核打击；其次，结束持续了23年的与整个西方的对峙状态。换来西方对毛政权及其毛思想的认同；再其次，将国人和全世界的视线从“九一三事件”上完全转移开来。结果证明，毛泽东的预期全部得以实现。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的地位和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促使西方国家元首纷纷来访和与中国建交：日本首相田中来访（1972年9月27日）、法国总统蓬皮杜来访（1973年9月11日），中国与英国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13日），中国与荷兰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1972年5月18日），中国与冰岛建交（1971年12月8日）、与希腊建交（1972年6月5日）、与日本建交（1972年9月29日）、与西德建交（1972年10月11日）、与西班牙建交（1973年3月9日）……用“雪崩效应”形容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引来的“中国热”是一点也不过份的。那时的中国大有“受天之祐，四方来贺”的架势啊！

而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顶级科学家、美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来华谒见，更使毛泽东龙颜大悦。怎有暇时再去关注温都尔汗那几个孤魂野鬼。

当毛泽东在书房和尼克松大讲蒋介石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时，文革的宗旨：反帝防修的伟大历史意义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所谓修正主义就是和帝国主义拉拉扯扯，当年毛泽东就是这样指责赫鲁晓夫的美国戴维营之行的。时至今日，埋葬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伟大使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历史重任都在周恩来与基辛格轻轻的碰杯声中化为乌有，犹如温都尔汗的那一声巨响，惊醒了中国人的文革大梦。

毛泽东大开大阖的实用性思维指导下的外交策略，不仅使自己轻松地走出了“九一三”的困境，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人的治国方略。受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邓小平。邓小平推行的最重要改革开放的举措都可以从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这一历史性事件中找到原始的发轫点。单就“开放”而言，追溯其起点就应该从1978年的冬天前推到1972年的春天；而作用于“改革”的“思想解放”还有比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北京握手更具示范性的吗？

## 结束语

有了林彪的鼎力相助，“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国不断升温发热，直至文化大革命成就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国的“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几乎是苏联“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重演。与“个人崇拜”如影随形

的冤狱与迫害也同时被复制。

但是，被誉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航程的历史性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呼吁（并实施）了对建国以后出现的冤假错案进行重新甄别的同时，却没有像苏共“二十大”那样直面产生这些“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个人崇拜”。

毛泽东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将“中国的赫鲁晓夫”之名搞得臭名昭彰，使得其后来人惟恐避之不及，无论是华国锋、胡耀邦、还是邓小平，抑或是后来人之后人。

毛泽东安卧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墓穴中。他心中曾经的“斯大林情结”和“赫鲁晓夫情结”在年复一年生死祭（忌）日时举行的庄严的朝拜仪式中蜕化、消解，化作一片浓重的精神雾霾弥散在紫禁城的上空，拢之不合，挥之不去，不知何时又要重新聚集，借体还魂，再次祸害中国的老百姓。

终稿于 2013 年 10 月 26 日 北京

---

【史林一叶】

## 北大文革中的“异端”组织与人物

舒 声

按：本篇原载丛璋、亚达、国真编辑整理的自印书《燕园风云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第二集，2013 年 9 月。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先在百度上搜了一下“异端”的定义：“异端指不符合正统思想的主张或教义，通常含有负面的含意，或称旁门左道；但也可指不重要的思想流派，即小道。”在北大文革中，紧跟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积极支持和参加文化大革命，并紧跟领袖支持的聂元梓的，自然就是正统，而对文革和领袖及其支持者有怀疑、不敬甚至反对的，自然就是异端了。还有个别人，思想比较奇特，不同于常人，有时发出惊世骇俗的不同于主流思想的言论，也可以称其为异端人物。从 1966 年 8 月到 1968 年 8 月，在北大陆续出现过不少具有异端思想的组织和个人，根据笔者的记忆，主要有以下几个：

### 一、“造三个大反”的乔兼武

乔兼武，原名乔俊礼，北京大学东语系缅甸语专业学生。1966 年 8 月 30 日，他与另一学生杜文革（原名杜文中）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轰动一时。它所指的“三个大反”是：“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第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在这份大字报中，他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建议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上述造三个大反就是“横扫”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造三个大反中最重要的是“取缔党团组织形式”，取缔的理由是“由于党组织领导政府，对党的各级组织，党外群众又无选举权和各种特殊权利”，所以“他们不受群众监督”。至于为什么“砸烂”各级办公室，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

当时的北大工作组刚被赶走，还没有分裂成为两派，他贴大字报纯属个人行为。从他的改名和大字报内容来看，他的作为可能比较轻率，属于文革初期思想活跃，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其思想大致仍属于巴黎公社式大民主一类。可以将他的观点归纳于“反党”，但实际上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的关于党的领导看法，实际上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相关的原则，是一种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而后来随着文革进程的发展，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党团组织实际被停止活动，党和政府被造反派夺权，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有的政权，似乎验证了乔兼武大字报的预见性。

在他贴出大字报的当日晚，北大文革筹委会召集大会批判乔兼武，宣布他为反动学生。但当时有人公开为他辩护，反对以言定罪，所以批判会尚比较缓和，会后亦未对他采取任何措施。在1966年12月伊林、淅西“反林彪”大字报贴出后，乔兼武又贴大字报为其叫好。此后，他才遭到进一步迫害。

## 二、杨勋和杨炳章

杨勋是北大经济系教师，1931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1年至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1964—1965年的社教运动中属于“左派”积极分子。杨炳章是她的弟弟，我的中学（北京101中）同学，1963年被保送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1964年自动退学，在北大听课。1966年7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到北大召开万人大会，江青在会上的讲话引起了他们的反感。7月26日上午，杨勋姐弟带上他们写好的一封信和几张大字报手抄件，来到中南海新华门，门岗叫他们去接待站，登记后被戚本禹带到钓鱼台国宾馆，见到了江青。杨炳章要见毛泽东，江青说毛很忙不能见，信件可以交给她代转。杨炳章只好把信和材料交给了江青。信的内容是：“建议毛不要让江青出来领导文化革命，不然会给毛主席老人家带来麻烦。”署名杨勋、杨炳章（杨勋弟）。可想而知江青看到信后会是什么反应。

杨勋从1966年8月到11月陆续贴出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称聂元梓是“北大文化革命的扒手”。1966年12月20日北大文革组织在大饭厅批斗“虎山行”战斗队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大会即将结束时，收到一张署名杨炳章的纸条，要为“虎山行”辩护，于是群起攻之，当场将杨炳章抓了起来，关在学生宿舍，又派人到他的住处搜查，抄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等文字，于是认定他为攻击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把他扭送至北京第一监狱（半

步桥)。23日，聂元梓又派人把刚外出串联回来的杨勋抓走，也送到了第一监狱。两天后他们被拉回北大批斗，杨炳章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被抄写成大字报公布在北大校园里，被称为当时“最反动最恶毒的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

杨勋姐弟坐了几年监狱后被释放，“四人帮”垮台后得到平反。改革开放后杨勋致力于研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安徽调研时写出的调查报告曾受到万里的好评。她的著作有《马寅初传》、《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乡村三十年》等，其代表作《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获1996年国家图书奖。2004年，杨勋的自传《心路——良知的命运》，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杨炳章被释放后回家乡当了几年中学教师，1978年考上北大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80年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任该校教授，1998年出版《从北大到哈佛》，记录了自己文革前后的经历。前些年他回到北京，在人大国际政治系任客座教授。我和杨勋姐弟曾在北京温泉附近杨勋的别墅里见过面，并接受过他们签名的赠书。

### 三、樊立勤和东方红公社

提起樊立勤，可以说在北大文革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生物系1963级学生，北京密云人。在北大文革中，他先反对工作组，后反对聂元梓，并最早贴出反对康生的大字报。1967年5月，樊立勤和部分北大教师、学生在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新北大东方红公社，发起人有：樊立勤、冯德荣、谢佐平、韩琴英、赵习文、俞芷倩、刘帼贞、颜品忠等。5月17日，他们在北大贴出了成立宣言。

这个宣言用的完全是文革中的语言，但矛头明确地指向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由于樊立勤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态度最坚决，聂元梓对他恨之入骨。

1968年3月27日上午10时许，聂元梓派人在校园里强行绑架抓走了樊立勤。

樊立勤后来回忆道：“他们逼我承认破坏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我拒绝了他们的这些指控和诬陷。他们连续对我施以酷刑。他们除了把我蒙上眼睛进行拷打之外，还用钳子把我的一双手食指夹断，把手指甲钉入签子，他们打断了我的胳膊和左腿，又往我右腿的膝盖钉入了钉子。在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神志不清之时，又往我身上泼冷水给浇醒，浇醒之后再问。他们打我打累了，就压在我的身上，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我被酷刑折磨了几天几夜，他们得不到他们预想的目的，我被打得落下了终身残废。他们是用麻袋把我先蒙住、盖住拉到刑讯室的。到了那里，拉下麻袋，然后给我头上蒙了两层手巾，挡住眼睛，在手巾外又绕了一二十圈绳子，他们把我从楼梯上往下踢、往下踹时，因为我的左右腿均已打断，站不起来了，他们就一层一层往下踢，这时身上已经没有麻袋了。”

3月29日，樊立勤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审讯他的人怕出人命，把他扔在学生浴室附近，被东方红公社的同伴发现，送到北医三院抢救。虽然生命被抢救过来了，但落下了终身残疾。

“四人帮”被粉碎后，樊立勤作为受迫害典型回到北大，并参加过落实政策的工作。很多人经常看到，他拄着一根木棍，在校园里蹒跚地行走。改革开放后他写过一些经济和体制改革方面的著作和回忆文章。虽然他的思想和观点不一定能够被时人接受，但他坚强的意志和不畏强权、宁折不弯的硬骨头精神受到了大多数人的钦佩。

#### 四、共产青年学会

1967年底，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忽然出现了一篇“共产青年学会成立宣言”，署名是技术物理系1962级学生何维凌、胡定国、王彦。这篇宣言内容大致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林彪的“顶峰论”提出质疑，声称要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并欢迎其他学生加入他们的组织。这三个人很快就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抓起来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关押在第一监狱。

何维凌，上海人，文革前是系里有名的才子，聪明有才华，学习成绩突出，据说自学了4门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学起来十分轻松，系主任胡济民发现了这颗“苗子”，特别批准他不用按照课表上课，可以在全校自由听课。文革开始后被当成“白专”典型受过批判。王彦是北京人，曾任学生会干部，文革前我和他一起参加过民兵舞训练，有些接触。文革中他们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活动，而是找了很多禁书来读，例如：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吉拉斯《新阶级》，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尼采《扎拉查斯特如是说》，陀斯托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象和理论，对共产主义，都有自己一些独特的思考。当然这些异端思想是不能被容忍的，聂元梓及其追随者在这点上嗅觉十分灵敏，立刻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中。

共产青年学会的成员在监狱中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被释放后没有参加正常分配，而是留校劳动改造。文革后周培源帮助他们落实了政策，留在北大工作。何维凌研究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并把这些理论与经济改革联系起来，和陈一谔、邓英淘（邓力群之子）等一起参加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写出了《经济控制论》、《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与邓英淘合著）等著作。1986-1987年，何维凌任康华中小企业国际联合公司总经理，1989年后去了美国，1991年因车祸死于墨西哥。王彦在1978年曾经到我上研究生的单位来找我，谈了一些如何考研究生的问题，以后没有再见过他，听说80年代曾主办过报纸，后也去了美国。

#### 五、井冈山、红联军等组织

“井冈山”、“红联军”都是1966年12月在北大出现的组织，他们对中央文革及江青在文革中的行为提出疑问和反对，对校文革表示不满，贴出过大字报，并在下面讨论过自己的观点，被校文革及其支持者发现后立即打成反动组织，加

以批判，大多数成员遭到迫害。其主要成员包括俞启义、赵丰田、马洪路、张志握、魏秀芬、卞宗美、刘秉慈等都受到了批判，“虎山行”是红联军中的一个小组，被《新北大》报称为其“别动队”，其主要成员杨作森和支持他们的乔兼武被送进了监狱。和俞启义、赵丰田、张志握来往密切的红联军成员、中文系学生沈达力认为：“井冈山、红联军不是反革命组织”，对中央文革的做法“想不通”，认为给林彪贴大字报的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在中文系受到多次批判，被迫自杀。

北大校文革的舆论工具《新北大》1967年2月1日用4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批判“井冈山”、“红联军”、“虎山行”的长篇文章。这些组织的成员后来都得到正常分配。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在西安工作时遇到过张志握，他在陕西省委党校工作。

## 六、崔子明、张拯、席关培

1967年1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穆欣、杨成武等接见北大代表聂元梓、夏剑多等五人。开始时康生拿着一叠信，对大家说：北大技术物理系有人写信给我，讲到乔兼武、李洪山、杨炳章等，意思是替他们伸冤，说有大字报批判他们，他们感到有压力，抬不起头来，你们知道吗？听了北大代表的回答后康生说：“对，就是要使反动言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们感到有压力，压得好。”（新北大公社动态 1967年1月7日）

康生说的给他写信的是技术物理系崔子明、张拯、席关培，这三人都是原子核物理专业1963级的学生，文革中派性并不明显，平时也并不活跃。1966年底他们给康生写信，对文化大革命中随便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分子表示不同意见，不料遭到康生的点名。聂元梓和校文革当然赶紧布置批判。好在他们的出身都很好，平时同学关系也不错，虽然班上个别极左的人想揪住他们不放，以达到立功目的，但大多数同学还是同情他们的，只是象征性地写了几张大字报，开了几次小范围批判会。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也没有再为难他们。

1982年我在西安遇到崔子明，他在陕西机械学院（后改名西安科技大学）教普通物理，后来和我经常来往。1998年校庆时见到张拯（在上海激光研究所任副所长）和席关培（在北京气象学院任社科系主任）。

## 七、齐菊生、陈醒迈、程汉良、刘立民

齐菊生、陈醒迈是化学系1963级学生，程汉良、刘立民是技术物理系1963级学生，1967年3月份后，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文革和北大的问题，观点比较一致，后来发起组织了“北京公社”。1967年8月北大的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井冈山兵团”，陈、程先后进入兵团总部，齐、刘先后成为03纵队和17纵队的负责人。1968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后，他们之间的一封信被化学系某女生发现上交，信的内容是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有所怀疑和不满，于是被当成“反动集团”受到隔离审查，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审讯逼供，他们的女朋友也都被迫交代和揭发他们的问题。1969年11月，程、刘随技术物理系师生去了陕西

汉中分校，陈、齐去了北京郊区农村。1970年3月，63-65级学生毕业分配，程、刘被当成有问题的人留在分校继续审查，过了3个月，程因态度较好被准许毕业，分配到陕西安康地区石泉县，刘因“态度顽固”，经常用马列和毛泽东的语录和工宣队辩论，一直到1973年春节才准许毕业，分配到河北衡水。这四个人都喜欢读书和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刘立民曾对班上同学说过：“文化革命不过是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利再分配，群众是被愚弄的，再过10年就清楚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都得到了平反，落实了政策。刘立民后来在武汉工作，成为电子电气和自动化方面的专家，2008年8月不幸因事故遇难，葬于北京门头沟万佛陵园。程汉良居住厦门，是成功的企业家。齐菊生旅居美国，陈醒迈在大连安居。

以上组织和人物虽然情况和遭遇各异，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

他们都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其中很多人读过大量书籍，有一定的才华；

由于他们观点有些超前，往往得不到当时多数人的理解，被视为异端，更不能见容于当权者，从而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到批斗甚至被关进监狱；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后继续从事各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从事教学、科研或经营企业者等则比较稳定，少数人参与政治斗争，则下场不好。

这也许就是北大人的特点与宿命吧！

---

【史林一叶】

## 北大与清华文革异同之比较

舒 声

按：本篇原载丛璋、亚达、国真编辑整理的自印书《燕园风云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第二集，2013年9月。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是中国著名的两所高等学府，相距很近，1966发生、1976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校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很多，两校对北京市和全国的影响都很大，两校文革的情况有很多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比较和分析，对研究文革和总结历史经验，应不无裨益。

### 两校文革背景与起源

北京大学历史悠久，前身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解放后从城内沙滩

迁移到原燕京大学校址，1952 年院校调整时清华大学文科和部分理科合并到北大。1958 年反右斗争后期，陆平调入北大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并带进了一批干部。1964 年 11 月中央派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率领工作队进入北大开展社教运动，执行了一套“左”的方针，以陆平为重点打击对象。北大干部分成了两派，支持陆平的包括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兼组织部长）、谢道渊（兼宣传部长）和大部分系总支书记，反对陆平的有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兼副校长）、党委常委崔雄昆（兼教务长）和小部分系级干部，包括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技术物理系总支戴新民等。社教后期，中央对工作队进行了调整，撤消了张磐石的队长职务，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1965 年 3 月），把两派干部集中到一起，宣布陆平“是好同志”，反对陆平的干部被整得灰头土脸，很多被派到农村搞四清。社教时期两派的斗争已经为文革埋下了伏笔。1966 年 5 月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和张恩慈（原北大哲学系教师）等七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来北京大学“调查”，曹轶欧任组长。在曹轶欧和张恩慈的支持下，5 月 25 日，聂元梓等 7 名哲学系教师贴出了“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和北京市委，大字报引起了全校的激烈争论和思想混乱。当天北大校党委常委会开会研究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问题，并请示国务院外办。外办副主任张彦答复：这是国家纪律，不要违反国家利益，要内外有别。常委中有二种意见；一种认为对大字报要加强管理，坚决按中央文件精神办，动员聂本人把大字报揭下来贴到指定地点（室内）；另一种主张坚决支持群众运动，支持大字报，支持左派。大字报已贴出了，不能揭下来。崔雄昆要陆平对聂元梓大字报明确表态。陆平表示，把他和宋硕说成黑帮，不同意。多数常委也表示：大字报的内容不符合事实，不能同意。“晚 8 点，校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表示欢迎对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写大字报贴到外边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精神。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校党委常委崔雄昆拒绝出席大会。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后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直接送给当时在外地的毛泽东。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

5 月 29 日戈华、崔雄昆正式写报告，反映“陆平镇压革命的罪行”，要求中央、华北局派工作组来校领导文化革命。

5 月 31 日崔雄昆给康生写信，反映北大存在的“严重问题”。

6 月 1 日晚 8 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从而引发了北大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上摘自《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王学珍等主编，2008 年版）

清华大学从 1952 年蒋南翔担任主要负责人后，一直按照蒋的教育思想进行各项工作，特别是 1957 年反右斗争把以钱伟长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打下去后，清华更树立起以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的绝对权威，蒋在全校干部和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党委主要领导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都是蒋的拥护者和得力助手，校党委被称为“不漏气的发动机”，党委所属各部，学校的各处、各



系总支（分党委）、系主任等各级干部也都是蒋的支持者，可以说是铁板一块。6月1日北大大字报广播后，在清华也引起强烈反响，6月2日校园里出现批评怀疑校党委的大字报，但党委立即组织反扑，贴出“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党委姓马不姓修”等大字报和标语，6月5日，刘涛、贺鹏飞等贴出“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震惊全校，蒋南翔赶回学校做检讨，得到热烈的掌声支持；6月7日北大生物系学生杨涛来清华煽风点火，受到围攻。6月8日清华校园里一片歌功颂德声，各教研组、政治课教师、辅导员在党委指挥下，写出大批歌颂蒋南翔的大字报。6月9日叶林率部分工作组成员到校，6月10日，大批工作组成员到校，和群众见面，晚上从高教部传来消息，蒋南翔已被停职反省。6月15日陶铸到高教部讲话，正式点了蒋南翔的名。（见邱心伟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

由此可见，北大的堡垒是从内部被攻破的，而且成为全国文革的导火索；清华的堡垒则主要是靠外力的作用被攻破的。

### 高层领导和中央文革对两校的影响

由于两校在全国教育战线的重要地位，中央领导对它们都非常重视，在文革中对两校的影响都很大，具体表现方式有：

公开指示，亲临指导，亲自接见，派人带信等。

#### （一）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北大的直接影响

- 1、1966年6月1日亲自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 2、1966年8月5日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称赞：“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得何等好啊！”
- 3、1966年8月17日为北大校刊题写《新北大》三个字。
- 4、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 5、1968年7月27日接见五大领袖，其中有关于北大的讲话。

#### （二）中央文革对北大的影响

- 1、1966年6月27日，陈伯达到北大看大字报，听取张承先、曹轶欧的汇报；
- 2、1966年7月22日，江青、陈伯达到北大看大字报，向师生发表讲话，并撇开工作组召开座谈会，个别召见聂元梓等人，鼓动他们起来反工作组，赶工作组；
- 3、1966年7月23日晚9时，江青、陈伯达再次来北大开座谈会，并在大饭厅发表讲话；
- 4、1966年7月25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来北大，主持召开万人辩论会；
- 5、1966年7月26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及中央文革其他成员和李雪峰、吴德等来北大，主持召开万人辩论会，号召搬开工作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6、1966年8月3日，江青邀请聂元梓坐她的车到钓鱼台吃饭，说聂写的大字报是她亲自送给毛泽东的，要聂“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让李讷转告我，我随时可以接见你”；

7、1966年8月4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及中央文革其他成员再次来北大，正式宣布撤消工作组，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对聂元梓当选为校文革主任“致以革命的祝贺”；

8、1966年8月30日，北大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王任重出席；

9、1966年11月13日晚9时许，王任重给聂元梓打电话说：“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今晚让你离开家，带上你认为最重要的材料，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10、1966年11月16日，江青找聂元梓密谈，说：“王任重是国民党派来的，你不要追随他”，“你到上海去串联，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的”。

11、1966年11月17日，王力找聂元梓谈话，根据江青谈话精神，对聂去上海做了具体安排；

12、1966年11月27日，聂元梓在上海与张春桥密谈，张说：“上海工人发动起来了，学生运动不行，希望你们起很好的作用”；

13、1966年12月16日，聂元梓回到北京，向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做了汇报；

14、1967年1月16日，陈伯达、江青召见聂元梓、孙蓬一。陈伯达说：“王任重很坏，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讲了孔繁、杨克明很多好话，讲了聂元梓很多坏话”，江青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

15、1967年1月22日，江青在部分高校造反派座谈会上支持聂元梓，批评蒯大富“对北大井冈山、红联军的态度是错误的”，“有人诽谤聂元梓同志，聂元梓有缺点、错误，但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是共患难的战友，是和反动路线作斗争的”。

16、1967年3月18日，聂元梓召开首都红代会核心组会议，决定发动10万人游行，打倒谭震林，聂当场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得到戚本禹批准。

17、1967年3月27日，陈伯达、戚本禹以座谈教改为名来到北大，他们提到社会上有人贴大字报攻击周总理时说：“现在提到炮打某某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都不可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

18、1967年4月14日，康生给聂元梓写信，说：“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彭真、刘仁等的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结果，看到了旧北京市委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聂元梓依照康生的指示，组织了“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在社会上大肆开展“抓叛徒”活动。5月17日，孙蓬一写信给康生报告第二战斗队工作进展情况，请示如何送材料，康生在信上批示：

“可直接送”。

19、1967年6月5日，晚，陈伯达来北大，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

20、6月8日，陈伯达又说“对新北大公社个别同志的意见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7月10日，陈伯达发表讲话说：“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聂元梓不要打倒，还要她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对孙蓬一也不要打倒，要一看二帮。”并对反对聂元梓的人说：“你们用我的话攻击聂元梓，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1、1967年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说：“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群众是好的。”

22、1968年3月27日，江青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讲话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

### （三）周恩来对北大的影响

1、1968年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即退出北大井冈山兵团）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的身份出国。

2、1972年7月2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学者杨振宁时，对周培源说：“你回去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3、1972年7月16日，周培源在校党委、革委会常委会上传达周恩来7月14日接见美籍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时的讲话：“北大的理论水平低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水平这样低？你回去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的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把它拔掉。”

文革中高层领导包括中央文革对清华的影响也非常大，直接间接的指示很多，简单列举如下：

#### （一）毛泽东文革中对清华的直接指示

1、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制止武斗；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并发表讲话。

2、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宾送的芒果转送给工人宣传队。8月15日，毛泽东接见工宣队代表。

3、1975年11月，毛泽东对刘冰等给他的信做出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4、197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130多位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中说：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 （二）中央高层其他人物对清华的影响

1、1966年6月18日，王光美到清华看大字报。

2、1966年6月19日，薄一波到清华看大字报，和蒯大富辩论30分钟；王光美在七饭厅见到同学说：“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的”。并表示如果大家要求，她愿当清华工作组组员。6月21日，王光美正式成为清华工作组组员。

3、1966年7月3日，薄一波再次来清华，又一次和蒯大富辩论。

4、1966年7月22日晚9时-12时，中央文革关锋、王力在新斋771号接见蒯大富，表示支持。

5、1966年7月2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讲话，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和全体代表见面。晚6点，王光美在一员工食堂讲话，说刘少奇曾经来清华看过3小时大字报。

6、1966年8月2日晚，周恩来、朱德来清华看大字报，找部分同学座谈至3日凌晨。

7、1966年8月4日晚8点，全校师生2万多人集中在东大操场，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等人参加大会，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工作组的错误，为蒯大富等平反。

8、1966年8月16日，周恩来分别找清华“八八”、“八九”及“临筹”负责人座谈。

9、1966年8月22日晚，全校召开万人大会，周恩来冒雨参加大会，并讲话。

10、1966年8月23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了蒯大富，对蒯单独成立自己一派红卫兵的想法给予了鼓励。

11、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在人大会议小会议室，分别找了三批观点不同的清华学生及蒯大富谈话，了解清华情况。

12、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8个组织的代表，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

13、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14、1966年12月30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等来清华和一些同学进行了座谈，傍晚时在西大操场与群众见面并讲话。

15、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和清华部分同学座谈，说毛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建议让她书面检查。

16、1967年1月7日，周恩来接见七机部“915”、“916”代表时，批评清华1月6日“智斗王光美”是“恶作剧，不正常”，“就是背后捣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

17、1967年1月20日，康生、王力、关锋接见蒯大富等人，指出康生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不能揪，要与中央党校“红战团”划清界限，康生交给蒯大富一些刘少奇的材料，要求把刘少奇批判到底。

18、1967年1月22日凌晨，陈伯达两次给蒯大富打电话，指出攻击康生是错误的；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革与大专院校学生组织座谈，江青点名批评蒯大富攻击陈伯达和康生是错误的。

19、1967年1月25日，康生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到清华参观，在座谈会上讲话，表明他是支持蒯大富的。

20、1967年1月26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大专院校代表，江青再次批评蒯大富。

21、1967年2月6日，谢富治接见一、二、三司代表，支持联合成立首都红代会，批评了蒯大富。

22、1967年2月7日，王力在新华社与清华和北航学生座谈时说：“打倒蒯大富我不赞成，但蒯大富有缺点，要批评”。

23、1967年2月22日，首都红代会成立会上，蒯大富向周恩来、康生“请罪”，周恩来说“不用请罪了，革命的犯错误是好事”，康生说：“不要再检查了，再检查就提高“红战团”的威信了”。

24、1967年3月26日，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清华部分教职工和“井冈山兵团”总部代表，谈复课、批和改的问题。

25、1967年5月12日，谢富治来清华，接见了“井冈山兵团”总部和“414”的负责人，说“414大方向有问题”。

26、1967年5月21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井冈山兵团”总部和“414”

的负责人，进行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谈话，在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四点协议”。

27、1967年5月30日，谢富治给蒯大富写信，说“周总理这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指革命委员会），建议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往后延迟几天，请考虑”。

28、1967年6月26日，陈伯达、戚本禹来清华，接见两派代表，指出：“联合起来讨论教改，坐下来协商，不要消灭一方，以对等原则召开联席会议”。

29、1967年8月9日晚，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韩爱晶等人，陈伯达指出“要撤离中南海；不要搞什么大串连”，对蒯大富说“清华出现414，那么多人反对你，对你是有好处的，锻炼你，看你能不能成气候”。

30、1967年9月16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北京“天派”各组织负责人，江青严厉批评清华《井冈山》报《评什么极左思潮》社论，说“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我的”，并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论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31、1967年12月17日凌晨，谢富治、戚本禹“与北京高校群众组织座谈整顿红卫兵和共青团组织的讲话”中谈到有关清华的问题，关于《414战歌》歌词是林彪的话，谢富治说“我从未听说过，是谣言”。戚本禹说：“清华大联合要以团派为核心，为基础，这是我们的意见”。

32、1967年12月27日，谢富治、丁国钰、李钟奇接见清华两派代表，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重新联合起来”。

33、1968年7月12日，谢富治通过吴德对蒯大富做了三点指示：一、撤除对科学馆的封锁；二、上缴武器；三、全面制止武斗。

34、1968年7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开会讨论《七三布告》，谢富治讲到清华问题，说“清华两万多人，双方参加武斗的不到两千吧。可见90%以上的人不赞成、不参加武斗。把什么事都压到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头上，我认为是不对头的”。

从以上并不完全的记录可以看出：

毛泽东和中央上层领导包括中央文革在内，对北大、清华的文革都非常重视，给予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文革发动前和文革初期毛和中央文革对北大的关注更多一些，文革开始后刘少奇通过王光美企图对清华施加影响，是想和毛对北大的控制分庭抗礼；毛解放了蒯，把蒯作为打击刘少奇的子弹；

周恩来文革中对清华的直接关注和影响比北大多，没有去过北大，对北大的影响只是通过周培源；

江青、张春桥等策动聂元梓去上海煽风点火，通过蒯大富打击刘少奇、王光美；聂、蒯成为中央文革的工具；

康生对北大关注和影响比较多，对清华的影响相对少一些；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谢富治对两校的关注和指示很多，但聂、蒯对他和市革委会不太买账，他的指示经常贯彻不下去。



## 高干子女在两校文革中的表现和影响

清华和北大学生中高干子女都不少，在文革中他们也参与了很多活动，对两校的文革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些是上层人物通过他们的子女对学校施加的影响。

### 高干子女在北大文革中的表现和影响

文革前进入北大的著名高干子女（据不完全统计）有——

李讷，毛泽东、江青之女，历史系学生，1965 年已毕业；

林立衡，林彪、叶群之女，中文系学生，当时已因病退学；

林立果，林彪、叶群之子，物理系 1965 级学生，文革开始后未再来校；

邓朴方，邓小平长子，技术物理系 1962 级学生；

邓楠，邓小平次女，物理系 1964 级学生；

贺晓明，贺龙之女，国际政治系 1965 级学生；

杨绍明，杨尚昆之子，历史系学生；

胡德平，胡耀邦之子，历史系学生；

傅彦，彭真之女，国际政治系学生；

李丹林，李雪峰之女，历史系学生；

林双双，林枫之女，化学系 1963 级学生；

雷渝平，雷英夫之女，中文系 1965 级学生。

张少华，毛泽东儿媳，毛岸青之妻，中文系学生。

以上高干子女在北大文革中多半是以受害者身份出现的。例如——

李讷，1966 年 7 月 26 日江青在北大群众大会上说北大干部郝斌、郝克明（胡启立之妻）等在四清中迫害李讷，不让她入党；又点名说张少华是假儿媳，阶级斗争搞到主席家里了，张少华闻讯后逃跑藏匿。

1967 年林立果给北大写了一封信，揭发北大“陆平集团”在文革前迫害他姐姐林立衡，迫使她退学，致使北大部分干部教师受到迫害，教务长崔雄昆 1968 年被迫自杀，副教务长王学珍、教务处副处长孟广平、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等受到批斗。

邓朴方 1968 年被聂元梓一派抓住，关押在物理大楼，被迫跳楼致残。

杨绍明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1966 年 6 月 18 日，被按在 38 楼前批斗。

1966 年 7 月 26 日晚的全校大会上，李杨杨代表 31 个干部子女讲话，说工作组是延安不是西安，事前他们曾经开会讨论，参加者有不少高干子女包括李丹林、张少华姐妹等，后遭到江青、康生的批驳。（燕园风云录（一），P64-66）

如果说对北大文革影响最大的高干子女，应该还是李讷，她受毛泽东和江青的委派，文革期间曾多次到北大活动，给聂元梓传达指示，例如让聂元梓去上海串联，煽风点火，就是李讷直接和聂联系的（见聂元梓口述回忆录），也把北大的情况向毛和江汇报，为毛的决策提供第一手信息。其次就是林立衡的“被迫害事件”，使北大部分干部、教师受到迫害。但李讷和林立衡对于她们给北大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导致部分干部、教师遭受迫害的事实一直没有道歉和表态，这是令

人十分遗憾的。

在文革初期，曾经有部分高干子女在北大贴出大字报，倡议成立“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协会”简称“贫协”，但未能得到广泛的响应，各系的“贫协”基本没有成立起来，后来这些高干子女的家长也都受到冲击，这个“贫协”也就无疾而终了。

至于那个著名的“血统论对联”传到北大后，自然也受到部分高干子女的支持和欢迎，在北大引发过激烈的辩论，但后来陈伯达、江青等人表态后，也就逐渐销声匿迹。

高干子女中只有邓朴方短期地进入过校文革，是一名普通的委员，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 清华高干子女在文革中的活动和影响

清华的高干子女著名的（据不完全统计）有——

刘涛，刘少奇之女，自动控制系9字班；

贺鹏飞，贺龙之子，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0字班；

刘菊芬，刘宁一之女，自动控制系7字班；

王小平，王任重之女，无线电系9字班；

陈元，陈云之子，自动控制系0字班；

李黎风，李井泉之子，工程物理系6字班；

陆德，陆定一之子，无线电系7字班；

雷蓉，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之女，无线电系6字班；

林梅梅，林枫之女，工物系6字班；

乔宗淮，乔冠华之子，工程力学数学系9字班；

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工程物理系0字班；

陈楚三，陈潭秋之子，数学力学系6字班；

郑易生，郑天翔之子，自动控制系9字班。

注：清华学生以毕业年份为班级命名（学制按6年计算），如6字班即1966年毕业，0字班即1964年入学、1970年毕业。因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提出学制要缩短，1965年入学的一届便改为5年制，也应于1970年毕业，为与1964年入学1970年毕业的“0字班”相区别，这届称为“00字班”。

与北大的高干子女在文革中的表现不同，清华的高干子女在文革初期是十分活跃的，很多人当上了校级和系级临时权力机构的头头，也经常通过大字报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对清华一个时期的文革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主导作用。

以下为《清华文革亲历：史料收集 大事日志》的不完全记录：

1966年6月5日，刘涛、贺鹏飞等贴出“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在当时校园里以“保蒋”为主的舆论下，产生震惊全校的影响。

1966年6月24日，贺鹏飞指使光0某些同学把蒯大富引出，进行辩论。

1966年7月7日，晚上，在中央主楼进行批判蒯大富的预演，李黎风主持，刘涛、贺鹏飞参加，王光美亲自督阵。

1966年7月27日，雷蓉、王小平贴出“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封信”，批评工作组，轰动全校；晚上，李黎风主持与水利系“反动学生”陈诞康的辩论会。

1966年7月28日，临时校系委员会主持与雷蓉、王小平的辩论会，会前未通知她们，会议主席李黎风撒谎说电话通知了她们。王任重、关锋等到会讲话。

1966年7月29日，雷蓉、王小平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六二四以后工作组的路线是错误的”，贺鹏飞、李黎风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走群众路线。

1966年7月31日，林梅梅、刘菊芬贴出“给王光美同志提点意见”的大字报。

1966年8月1日，贺鹏飞、刘涛、李黎风、乔宗淮、邱承光等贴出大字报“我们的责任”，认识到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反蒯是群众斗群众。

1966年8月3-4日，各系陆续成立“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下午，刘菊芬出面组织自控系红卫兵，孙怒涛申请加入未被批准。

1966年8月19日，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小平等贴出“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

1966年8月21日，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揭发批判王光美的错误，表示要和王光美划清界限；贺鹏飞等立刻贴出大字报“坚决支持刘涛同志的革命行动”。

1966年8月22日，晚上全校大会，周总理冒雨出席并讲话，贺鹏飞发言作了检查，尖锐批评工作组。

1966年8月24日，下午2：45，在刘涛的指示下，自控系红卫兵手持皮鞭木棍占领了广播台，4：00，12个学校的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会，贺鹏飞讲话，4：50，12校红卫兵跑步进入清华，封锁大礼堂前大字报区；5：10，广播台广播12校红卫兵的“告示”，勒令大字报作者撕去有关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6点，贺鹏飞等指挥红卫兵推倒了清华标志性建筑二校门；7点，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个精光；8点，红卫兵在西操场开会庆祝胜利。9点撤离学校；半夜，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一些人到校内部分干部、教师家中抄家、拷打，强迫中层以上干部到被推倒的二校门搬运砖石；贺鹏飞把在清华拍摄的大字报底片交给王任重秘书。

1966年8月25日，清华中层以上干部继续到二校门拆卸搬运砖石，稍有缓慢即遭红卫兵毒打，校园里出现大量“8·24革命行动好得很”、“就是要红色恐怖”等大字报；晚上在大礼堂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大会，一名红卫兵提出解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席台上的贺鹏飞等人全部鼓掌。

1966年8月26日，清华组织1500名红卫兵进城游行，贺鹏飞叫自控系红卫兵把守车门，反复检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出身、成分；中央文革联络员向贺鹏飞传达了严禁打人的命令，贺未向同学传达；晚上清华红卫兵总部组织抄地、

富、反、坏、黑的家，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求参加，遭到刘涛拒绝，说“你们组织不纯”；当日《人民日报》发表刘菊芬执笔的“清华园必须大乱”的大字报。

1966年12月26日，王小平贴出“造王任重的反”大字报。

1966年12月28日，刘涛做公开检查：“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揭露刘少奇、王光美、王任重等对清华文革的影响；王小平贴出大字报“‘三问王光美’是怎样出来的？——王任重和刘少奇的关系”。

1967年1月2日，刘涛和刘允真贴出“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大字报，《井冈山》报刊登此文，大量印刷。

1967年1月3日，乔宗淮贴出“我的检讨”。

1967年1月6日李黎风贴出“我的第二次检查”。

总的来说高干子女在清华文革中的活动是十分积极活跃的，其中贺鹏飞、刘涛等起的作用更是十分突出，他们在冲击蒋南翔、斗争蒯大富、成立红卫兵、宣扬血统论、争夺文革领导权、制造红色恐怖、抄家破“四旧”、破坏标志建筑物、迫害革命干部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和恶劣的作用，这与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敏感性，唯我独“左”的思想以及家长和中央文革某些人背后的指使都有重要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他们的地位随着父母的被打倒而一落千丈，有的人遭遇也很惨，文革后他们应该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思，但很少有人写出这一段历史的回忆，现在他们也都进入晚年，希望能够勇于自我解剖，写出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回忆与反思，留给后人。

## 清华、北大文革组织及负责人组成的异同

### （一）北大文革组织及负责人

#### 1、校文化革命委员会

1966年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聂元梓，副主任委员白晨曦（原人事处副处长）、聂孟民（物理系学生），常委牛皖平（北大附中学生）、徐运朴（俄语系研究生）、廖淑明（国际政治系学生）、戴新民（原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办公室主任李清昆（教师），副主任杨克明（教师）、夏剑豸（教师），办公室下设11个组：毛主席著作学习宣传组、武装保卫组、组织组、宣传组、专案组、动态组、大字报组、接待组、生活总务组、秘书组及联络组。

1966年9月11日，校文革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副主任孔繁（哲学系干部）、聂孟民、杨学祺（生物系学生）、白晨曦。常委：冯迎玺（干部）、戴新民（干部）、段心济、廖淑明、徐运朴、刘宗义（学生）、刘国政（学生）、牛占文、唐景春。

1967年2月14日，校文革将孔繁、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聂孟民赶出常委会，补充姜同光、裘学耕、王海忱为副主任，孙蓬一（哲学系教师，聂元梓亲密战友）、王茂湘（经济系教师，聂元梓坚定支持者）、侯汉清（图书馆系研究生）为常委。

1967年3月，孙蓬一被升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

1967年4月，成立校行政工作委员会，主任周培源，下设教改组、教务组、人事组、后勤组等。

1967年5月，成立校斗批改委员会，主任崔雄昆。

1967年6月后，徐运朴、侯汉清参加井冈山兵团，戴新民被怀疑为叛徒，被校文革清除。

由以上名单可以看出：

(1) 校文革的主要领导权掌握在干部和教师手里，学生不过是摆设；

(2) 校文革下属机构比较健全，反映了北大干部有一定的管理工作经验，全面掌握了北大的实际领导权；

(3) 校文革主要成员不断变化，是聂元梓及其亲信不断排除异己，打击排斥有不同意见者，这些人中有些后来遭到残酷打击，有些参加了反对派组织。

## 2、新北大公社

1967年2月15日“新北大公社”成立，总部成员有：卢平（中文系学生）、刘冲（经济系学生）、夏剑豸（哲学系教师）、孙月才、李长啸等，各系各单位纷纷成立“新北大公社战斗团”，成为在校文革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公社的主要负责人是学生，但完全听命于校文革。

1968年3月20日，校文革决定成立“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高云鹏（哲学系干部）为总指挥，宫香政（技术物理系学生）、黄元庄（伙食科工人）为副总指挥，卢平为政委。

## 3、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1967年8月17日，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红旗飘战斗队、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周培源，副组长：牛辉林（法律系学生）、徐运朴（研究生）、侯汉清（研究生）、陈醒迈（化学系学生）。后周恩来劝告周培源退出井冈山，牛辉林为核心组长，9月1日江青点名“红旗飘里有坏人”，侯汉清接任核心组长，牛辉林改任副组长。1968年3月北大发生武斗后，徐运朴被校文革和公社抓走，牛辉林逃到校外，坚持在校内与聂元梓斗争的井冈山核心组成员主要是：侯汉清、胡纯和（哲学系学生）、谢纪康（物理系学生）、靳枫毅（历史系学生）、陈醒迈等。

井冈山兵团主要领导成员是学生，干部教师参加和支持井冈山的也很多，例如原北大副书记、副校长戈华、团委副书记郭景海、东语系主任季羨林（曾任纵队负责人）、地球物理系干部王桂芹（任纵队负责人）、哲学系教师孔繁、杨克明（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李醒尘（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郭罗基、国际政治系总支书记张侠，历史系副主任、教授周一良等，但他们没有起到主导作用，顶多是参谋和顾问，武斗期间干部都没有参加。

## 清华的文革组织及其负责人

### 1、井冈山兵团（团派）

1966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筹委会成立，成员为：蒯大富、

陈育延、唐伟、鲍长康、刘才堂、孙怒涛、王良生、潘剑虹、崔兆喜、邵凯胜等 20 人；后经演变，井冈山分裂为团派和 414 两派。团派的主要头头为：

蒯大富：工程化学系 63 级学生  
鲍长康：工程化学系 63 级学生  
刘才堂：工程化学系 63 级学生  
陈继芳：冶金系 64 级学生  
马小庄：冶金系 64 级学生  
陈育延：数学力学系 65 级学生  
王良生：水利系 63 级学生  
潘剑虹：机械系 61 级学生  
任传仲：自控系 65 级学生  
革命干部代表：韩银山、张修身

## 2、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四派）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于 1967 年 5 月 29 日正式宣告成立，总部主要成员为：

沈如槐：数学力学系 64 级学生  
孙怒涛：自控系 60 级学生  
汲 鹏：压 00 学生（65 级）  
宿长忠：水利系 61 级学生  
陈楚三：数学力学系 60 级学生  
刘万章：工程物理系 60 级学生  
张雪梅：水利系 64 级学生  
蒋南峰：无线电系 60 级学生  
高季章：水利系 63 级学生  
周泉纓：动力系 60 级学生  
革命干部代表：龙连坤、李振民、谭浩强

清华团派和四派的核心人物都是学生，干部的作用不过是参谋和顾问，只能起到配角的作用，这点和北大井冈山相似。但团派头头中低年级的比例大，四派头头中高年级的多一些。

## 两校武斗情况之比较

### 北大武斗

北大大规模武斗发生在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校文革指使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夜间进入井冈山成员较多的 31 楼（化学系男生宿舍），将井冈山成员驱赶出去，开创了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的先例。后井冈山陆续占领了 28、30、32、35、36、37 楼，并用天桥和地道连接起来，与新北大公社对抗，由于校文革采取了断粮、断电等措施，井冈山接受了校外的支援（粮菜等），采用带电作业接上了电源。

北大两派武斗中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长矛、铁棍和强力弹弓（用自行车轮胎制

作)，在 7 月 22 日井冈山接电时爆发的武斗中双方使用了燃烧瓶，公社方面使用的燃料是乙醚加黄磷，井冈山使用的是汽油。工宣队进校后两派上缴的武斗工具是长矛、铁棍、弹弓和护身甲、安全帽，双方各数百套。

北大在武斗战场上没有人员死亡，但伤者很多，笔者曾经见过一位东语系学生一只眼睛被弹弓打瞎，后安装了假眼，还有一位同班同学被抓去打断腿，在地质学院休养 2 个月才好。武斗期间死亡 3 人，一人为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因到图书馆翻看书报，被公社武斗队抓走打死，另外二位死者是殷文杰（无线电系学生），在 44 楼附近去食堂吃饭时被公社武斗队用长矛刺死，刘玮，地质地理系 66 届毕业生，欲回校办理毕业手续，被公社武斗队抓到 40 楼，毒打致死。打死这 3 人的主要凶手在 1973 年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法办。

### 清华武斗

清华两派最早的武斗发生于 1968 年 1 月 4 日深夜，团派进攻位于 12 号楼的自控系 414 广播台，414 二人跳楼重伤，3 人被俘，团派受伤者近百人，30 多人入院治疗。（大事日志，P135）。次日凌晨，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来校主持谈判，双方签订了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

1968 年 4 月 23 日，清华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武斗。此后武斗连绵不断，最严重的一次是 1968 年 5 月 30 日，在东区浴室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伤惨重。

清华武斗期间，使用了长矛、弹弓、燃烧瓶，甚至动用了枪支、手榴弹，还制作了和使用了土坦克（用汽车改装）。

武斗期间清华死亡的人员有：姜文波、谢静澄、孙华栋、许恭生、卞雨林、段洪水、刘承娴、朱玉生、杨志军、杨树立、钱萍华、范仲玉、范崇勇。（唐金鹤《倒下的英才》，527-530）

1968 年 7 月 27 日，工人宣传队被打死的有：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重伤 149 人，轻伤 582 人。（大事日志，P376）

### 两校武斗之比较

持续时间：北大武斗持续时间长，约 4 个月，清华为 100 天；

武斗规模：清华武斗规模比北大大；

使用武器：北大武斗基本使用冷兵器，清华使用了枪支弹药、土坦克，比北大级别高；

死伤人数：清华武斗死亡人数远远多于北大，还打死打伤了多名工人宣传队人员；

财产损失：造成建筑物、楼内设施等公共财产的损失都很严重。

### 两校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

所谓非正常死亡包括被毒打、折磨而死，武斗中死亡和采用自杀手段死亡。据王友琴调查统计，文革期间（1966-1976）北大非正常死亡 63 人，清华 58 人。

北大在工作组期间非正常死亡 2 人，占全部死亡人数的 3.2%，校文革期间

死亡 23 人，占 36.5%，工宣队、军宣队期间死亡 38 人，占 60.3%。其中 1966 年 15 人，1967 年 1 人，1968 年 34 人，1969 年 4 人，1970 年 5 人，1971 年 2 人，1973 年 1 人，1975 年 1 人。死亡最多的是 1968 年，占 54%，其次为 1966 年，占 23.8%。工、军宣队期间死亡人数最多，校文革期间其次。

北大非正常死亡人员中：教师 28 人，干部 5 人，学生 9 人，职员工人 13 人，家属 2 人，居民群众 4 人。

死亡的教师中教授达 12 人，其中一级教授 2 人：翦伯赞（历史学家）、饶毓泰（物理学家）；二级教授 5 人：向达（历史学家，原一级，反右后降为二级）、俞大綱（西语系）、陈同度（生物系）、崔芝兰（生物系）、王重民（图书馆学家），三级教授 4 人，四级 1 人。北大文革期间教授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清华。

还有 2 名校级领导：翦伯赞副校长和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昆。

文革中清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包括在武斗中死亡的 13 人，和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迫害自杀的教师、职工、学生等。

在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只列出了以下人员：

卞雨林、程国英、程应铨、陈祖东、段洪水、李丕济、刘承娴、李文元、李玉珍、罗征敷、路学铭、潘志鸿、钱平华、王大树、王慧琛、王松林、杨景福、殷贡璋、张怀怡、张旭涛、邹致圻和清华附中的郭兰惠、刘澍华、赵晓东。

和北大相比至少可以看出：

清华学生死亡人数比北大多，是因为武斗规模和惨烈程度大；教授特别是著名教授死亡人数较少，校级领导干部没有死亡的。

关于清华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详细情况的统计分析有待清华校友进行。（本刊注：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已经整理有《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载《记忆》2010 年第二期，总第 42 期，2010 年 1 月 31 日出刊。）

## 北大与清华两派组织斗争的性质

### 北大井冈山与聂元梓校文革之间的斗争

北大文革中的两派斗争实质上是以井冈山兵团为代表的师生员工与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井冈山兵团与新北大公社两个群众组织之间斗争。聂元梓在第一张大字报公布后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代表，在工作组撤出后，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成立了以她为首的校文革，实际上成为北大的权力机构。校文革全面奉行文革极左路线，对内残酷迫害革命干部、教师，开办劳改大院，把干部、学者关进牛棚，打击镇压有不同意见的组织和学生，任意抓人批斗、逼供，或送交公安机关；对外到处伸手夺权，按照康生指示抓“叛徒”，积极揪斗刘少奇，炮打邓小平、朱德、谭震林等，甚至整理了周恩来的黑材料（《北京大学纪事》，P777），冲击部队大院，抢走保密文件，支持外地武斗，校文革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许多干部、教师、学生被迫害致死或致残。1968 年 3 月后，校文革组织指使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发动武斗，对不同意见的群众断粮断电，随意打死无辜群众，在校园里



实行“白色恐怖”。工宣队、军宣队在进校后，经过大量调查，给校文革做出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的结论，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以历史的眼光看，聂元梓、校文革统治北大的时期，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井冈山兵团的前身“老井冈山”和“红联军”等组织，1966年11月起就开始反对聂元梓、校文革，怀疑中央文革，1966年12月19日起，聂元梓、校文革开始批斗、抓捕井冈山、红联军重要成员，12月23日，井冈山、红联军被查封。1967年3月，部分原校文革成员和干部，由于不满聂元梓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在整风中提出意见，遭到聂元梓的打击，与其分道扬镳。1967年8月，井冈山、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团五个组织合并成立井冈山兵团。在当时，聂元梓是得到中央支持的闻名全国、炙手可热的造反派领袖，要反对她，需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和可能受到迫害的精神准备，可是，出于强烈的正义感和理性思考，井冈山的成员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抗聂元梓的悲壮道路。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井冈山也并没有看清文革的本质，只能打着拥护毛泽东、拥护中央文革的旗号，有时也要利用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等人 与聂元梓之间的矛盾来反对聂元梓，否则他们也很难生存下去。井冈山兵团缺乏理论家，从总体上并没有提出过系统的理论，但其中有很多人对文革进行过怀疑和思考，对林彪的“顶峰论”和江青、陈伯达、康生的错误做法提出过质疑和反对。由于年轻幼稚和缺乏政治经验，井冈山也犯了很多错误，在对外斗争方面，包括批判刘少奇“反动路线”、支援外地造反派、在外单位夺权等方面井冈山和其他群众组织一样，也是受上层利用的。文革后，井冈山中没有一个人成为“三种人”而受到刑事处罚，井冈山三任一把手中，周培源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牛辉林成为山西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侯汉清成为著名图书馆学专家、大学教授。而聂元梓、孙蓬一、高云鹏等校文革的主要领导和打死3名无辜群众的凶手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被判处有期徒刑。

新北大公社只是在校文革的操纵下成立的一个群众组织，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的广大群众，只是观点上的不同，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两个群众组织的成员，应该能够共聚一堂，回忆往事，共同总结当年的经验教训，把文革的事实真相传之后世了。

### **清华团派和414之间的斗争**

和聂元梓成为造反派代表人物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不同，蒯大富的出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他是在受到工作组的打击后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成反击刘少奇的一块石头而树立的典型。但他被解放后头脑发热，自我膨胀，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把不同意见的群众推到了对立面。团派（井冈山兵团）是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群众组织，414是从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来的群众组织（从其名称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就可以看出）。

团派和414派在对待文革和文革前17年的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团派的“彻底砸烂”和“大翻个”理论，414的“十七年红线主导”和“造反派打江

山不能坐江山”的理论，虽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两派大多数人的思想，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时的讲话明显是宠爱和偏袒蒯大富的，而对414没有好感，证明蒯大富和团派的理论和实践更加接近毛的路线。414作为蒯大富和团派的对立面，虽然在某些方面如干部路线上抵制了蒯的错误，更加符合广大干部的要求和利益，但从整体上也没有跳出“左”的窠臼，从他们把林彪“完蛋就完蛋”的语录当成战歌，也可以看出一种浮躁狂热的心态。

在诸多清华学子回忆和反思文革的著作中，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无疑是对两派组织解剖最深刻的，他说：“从指导思想而言，两派都是信奉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理论，贯彻执行文革路线的。从行为实践而言，两派的表现都是极左的，都同样在做着批判刘少奇，揪斗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当时认为正确的事情，都在保护一部分干部的同时打击压制另一部分干部，互相激化矛盾最后武斗。所以团四两派都是错误的，应该基本否定。”他还说：“我的看法是：并不是414比团派正确的多，而是团派比414错误得多。由于团派贯彻极左的文革路线比414更积极更紧跟，由于团派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而414一直被中央文革打压，由于团派始终处于掌权的多数派地位而414一直是在野的少数派，由于团派要‘彻底砸烂旧清华’因而对干部的迫害比信奉‘红线主导’论的414更甚，由于团派几次挑起武斗而414基本处于招架的守势，所以团派所犯的错误比414大得多，责任也重得多。”（《良知的拷问》，680）

笔者以为，孙怒涛的看法基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对两派组织的一个客观总结。孙怒涛在其著作中并没有简单地全盘地否定团派和414思潮，而是认为：“当年的团派思潮和414思潮，不管多少，都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团派观点激进却富有批判精神，414态度温和但思想比较守旧。他们之中都有可取的也有应该扬弃的部分。当年团四两派追求、捍卫各自思潮中的合理成分，表达正当诉求，这本身并没有错。如果整个社会环境是法制的、民主的、宽松的、包容的，那么两派理解、认同对方正确的观点，兼顾彼此合理的利益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文革这样的大环境下，双方顽强捍卫各自的正确观点，拼死追求各自的合理利益，从开始的口诛笔伐，最后演变成兵戎相见。这是清华两派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良知的拷问》，694-695）。这是十分可贵的反思。

### 参考文献——

王学珍、王孝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第二版

丛璋、亚达、国真主编《燕园风云录（一）》，2012 年第一次印刷

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 年第一版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年第一版

唐金鹤《倒下的英才》，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 年初版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11年第一次印刷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二版

---

【书海泛舟】

## 《燕园风云录》第二集

### 前言

丛璋、亚达、国真

《燕园风云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去年问世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很快发送一空，并被部分大学图书馆收藏。根据广大读者要求，为研究北大文革历史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我们又收集了部分文章和资料，编辑了本书的第二集。本集分为：文革回忆、专题研究、人物回忆、采访手记和原始资料几个部分。其中，彭珮云、李雪峰、张承先作为当时亲身接触北大文革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回忆录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原哲学系教师颜品忠先生在去世前呕心沥血写出的回忆录，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哲嗣精心整理先父遗作，功不可没。专题研究、人物怀念和采访手记，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对文革中的人和事进行了反映。原始资料收集不多，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

目前，对北大文革历史的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仍然很不够，缺乏有深度有力度研究成果，研究力量也很分散。但最近几部分研究者开始互相联系，并有整合力量、合作研究的意愿，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动向和开端，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快研究的步伐，促进研究向纵深发展。

最近编者之一参加了清华大学原两派成员组织的清华文革研究讨论会，他们把收集资料和约请文革亲历者（主要是老干部、老教师）进行访谈作为两种主要工作方法，制订了计划，开展工作，对我们很有启发。老干部、老教师，他们的经历对后人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已经有很多老人因自然规律而离开人世了，抢救他们头脑中的历史资料不容稍缓。

北大文革参加者包括当时的学生、教师、干部和职工，以及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等校外人员，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都对北大文革有切身的感受，能够提供各种信息。我们热切地希望上述人员都能抱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尽早把自己的记忆留下来，如果有困难，我们愿意采访帮助。

相信北大文革历史研究能够有新的突破和进展。我们期待着。

### 目 录

#### 文革回忆

1. 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彭珮云 5
2.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李雪峰 13
3. “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张承先 31

4. 回忆李讷与阮铭在文革中的秘密活动·····	聂元梓	45
5. 我的学生李讷——江青之女·····	郭罗基	52
6. 历经北京大学的磨难——节选自我给毛毛的一封信·····	樊立勤	62
7. 一个北大哲学系普通教师的动乱劫难·····	颜品忠遗作 颜吾爻整理	84
8. 老来忆“牛棚”·····	郝 斌	181
9. 文革武斗期间北大天桥架设的回忆·····	况明星	189
10. 回忆文革片段·····	谷世宁	193
<b>专题研究</b>		
11. 张恩慈与“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	李 琳	201
12. 《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一)·····	何洛、孟金	206
13. 《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二)·····	何洛、孟金	217
14. 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	王友琴	227
15. 北大文革中的“异端”组织与人物·····	舒 声	241
16. 清华北大两校文革异同之比较·····	舒 声	249
<b>人物怀念</b>		
17. 燕园月夜望星光——怀念周培源先生·····	马洪路	270
18. 林焘先生和文革历史·····	王友琴	274
19. 北大才子沈元之死·····	王 锐	279
<b>采访手记</b>		
20. 陆平女儿采访记·····	陈 洁	290
21. 文革“御笔”沉浮录——范达人回忆梁效·····	齐 民	296
<b>文革史料</b>		
22. 《新北大》创刊号解读·····	转自中国文革网	314
23. 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 创建新世界·····	乔兼武 杜文革	320
24. 陈伯达1967年6月5日讲话·····		325
25. 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 的三个报告·····	转自中国文革网	331

---

#### 【故纸堆】

### 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 造三个大反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乔兼武 杜文革

按：本篇原载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办公室编《大字报选》（增刊六），1966年8月31日出版。本刊转载于丛璋、亚达、国真编辑整理的自印书《燕园风云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第二集，2013年9月。

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提出了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旧世界的汪洋中首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更把马列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天才地创造了现今改造世界的最强大最伟大的武器——毛泽东思想！

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胜利，它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在从旧世界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仍然大量地存在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而且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还在产生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着修正主义思想，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艰巨卓绝而又具有伟大共产主义意义的工作，还仅是开始，远没有结束。就我国的情况来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还没有得到改造，还在沿用着这些腐朽的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上层建筑。因此，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应当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才一百余年，作为一种学说，是已经确立了，但是它还没有最后战胜它的顽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远没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还远没有砸烂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我们这一代身上。

我们国家现行的各种制度，从党政机关各种制度，到工农业生产的各种经营管理制度，到商业、服务行业的各种营业制度，到教育界、新闻界、历史界、文艺界的各种制度，总之，包括一切现存的上层建筑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来批判、改造它们，要破字当头，在大破中大立无产阶级的新制度，以便顺利建成社会主义，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我们就提出三个破旧立新的大胆建议。

### **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无产阶级以其先锋队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动员组织领导其他阶级、阶层的劳动人民，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是完全正确的，适用和必须的。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了妨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旧的组织形式，应该立即取缔、改革，代之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由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式的群众性组织——革命委员会。

### **一、现行党团组织形式的罪状如下：**

1.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本应大搞特搞伟大的群众运动，但它们不利于搞群众运动，因而，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智慧和力量得不到充分的运用。

2.由于党组织领导政府，对党的各级组织，党外群众又无选举权，和各种特殊权利（像接受新党员的表决权等），因而实际上没有发动全民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是全党在搞。

3.由于他们不受群众监督，尤其是那些反党黑帮分子，肆意对抗党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瞒上欺下，往往以反党大帽子压人，因而，容易产生修正主义，便于他们搞阴谋，以篡党、篡军、篡政，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4.它们疏远领导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妨碍领导与群众实行结合。因而，某些领导严重脱离群众，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高高在上，当官作老爷，严重地产生官僚主义。

5.它们不利于把毛泽东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不利于贯彻执行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其他一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针、政策。

6.采取入党的方式鉴别别人、考验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科学的。思想意识的东西，不能只考验一年半载，而要锻炼一辈子、考验一辈子，采取入党的方式检[查]别人，就容易给投机分子以钻空子的机会。总之，这种组织形式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7.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由列宁、斯大林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沉痛的教训，使我们深思：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里的复辟与继续沿用党团组织不能是没有关系的。

8.有些坏的党组织盗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名义，利用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把群众引入歧途，群众也往往上当，反映出保卫某某基层党组织就是保卫党中央。

### **二、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指导思想：**

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建设原则，完全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坚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它的最低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最高纲领：在全球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它的选举制：《十六条》第九条中的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人民才有选举权，敌人没有选举权。

它克服了党团组织所有弊病，是大搞群众运动的最好形式，是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组织形式，是高度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最好形式，是用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贯彻毛泽东思想方针政策的最好组织形式。总之，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组织形式。

### 三、对把党团组织改革为革命委员会的几点意见：

1.党中央一级不能改选，但要更名为中央革命委员会。毛主席任中央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林彪同志任副主席，由他们二人负责组成中央革命委员会，它原则上应以原中共中央委员会为基础，只把那些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清除出去。

2.军队各级党组织原则上也不改选，只要更名为革命委员会，适当地调配即可。

3.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革命委员会可指派专人到各地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首先组成地区、省市、自治区两级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暂时代替这两级的原党组织的一切职权，并负责筹备成立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改革党、团组织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应立即动手作，这是由全国当前革命形势决定的。目前，各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很大，很多党组织不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对他们镇压、迫害，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现在全国阶级斗争形势是：反动势力与革命势力已针锋相对，短兵相接，展开了大搏斗，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搏斗、大组合的极其尖锐复杂的伟大阶级斗争时代。代表反动势力一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凭借职权，占着优势，疯狂地向革命势力反扑。我们应该改变这种资产阶级占优势的斗争形势，以使斗争利于无产阶级，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敌人越猖狂、越挣扎，就越临近灭亡，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就越临近更加伟大的新胜利。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透过貌似强大的表面现象，看到反动势力即将灭亡的纸老虎本质，狠狠地打击他们，把他们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新胜利，它将为顺利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下可靠的基础。

## 第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

用党政两套组织形式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不科学的，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与业务又是紧紧相联的，二者绝对不可分割，正像人体与精神不可分割，刀子和锋锐不可分割一样。这是毛泽东主义的精髓。

但是，资产阶级的党政两套组织形式，人为地使政治与业务分离，形成党组织是抓政治工作的，政府就是搞建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象，而且造成国家机构庞杂，浪费人力物力，搞繁琐哲学，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它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桎梏，因而应该立即废止，实行党政合一，由革命委员会完全地担当起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

任务。下设各种组织机构，坚决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反对党政两套而且臃肿庞大的政权组织和干部队伍。

### 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办公室的工作制度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制度，不是无产阶级的工作制度，而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工作制度，因为它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我们应该立即动手砸烂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切办公室，到茅房草舍、田间地头、到工矿企业、到厂房宿舍、到军队驻地营房、到柜台边、到一切有群众的生产部门、单位、农村、工厂，把办公室牢牢地建立在群众中、实际中、生产劳动中，每一个国家干部都要做既劳动又办公的人民勤务员。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一个坐在高级办公室的三脱离干部，一是听不到群众的呼声，看不到群众的一点情况，觉不出一群群众的阶级感情，不知道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二是高高在上，严重地脱离实际；三、脱离生产劳动的边。他们难道能够领导群众干社会主义？难道能领导好？他们难道能做群众的勤务员、一个普通劳动者？完全不能！绝对不能！他们的领导只能是反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修正主义的领导，当官作老爷的领导，根据自己的意愿乱发号施令的领导，这样的领导必须彻底反掉，换上毛泽东主义的领导。办公室工作制度的罪状与党团组织一样，而且各条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更要以十倍的干劲彻底捣烂它！

在办公室里是干不成革命的，只能当官作老爷。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旦让他三脱离，他一天也呆不下去。所以我们必须砸烂它！把脚跟站在人民一边，把办公室设立在群众中、实际中、生产劳动中，都变成人民的勤务员和普通劳动者。

这个重大变革将对建设社会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意义是极其伟大的。

以上就是我们三项大胆的建议。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毛泽东主义的光辉哺育我们成长。我们是毛泽东主义的红卫兵，是最高指示的忠实执行者。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们就是应该造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主义，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旧东西的反，造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用毛泽东思想彻底地批判改造旧世界，创造无产阶级新世界的一切！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敬爱、最伟大、最光荣、最英明、最天才的旗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展眼观未来，定将是赤旗环球！誓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四旧”！

北京大学东语系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乔兼武 杜文革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原注〕按贴出的大字报原文排印。乔兼武（原名乔俊礼）、杜文革（原名杜文忠）是东语系缅二学生。

---

### 【编读往来】

#### 晓星谈陆小宝文

《昨天》24期刊发的陆小宝《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以下简称陆文），是一篇发人深思的好文章，眼光独到，非同凡响。

十年文革，大潮退去，除了无数鲜血和眼泪，除了遍地坑灰和瓦砾，是不是还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可资借鉴的东西呢？这个问题，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思考，陆文更是旗帜鲜明：“文革必须否定，但不能彻底否定，更不能简单否定。”这显示民间对文革史的研究，已经摆脱了概念化的束缚，也冲决了官方设定的藩篱，正在向纵深推进。

“彻底否定文革”这种提法，在拨乱反正之初，为了排除各种干扰、迅速回到正轨，或许有其实用价值。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这个提法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虽对文革作出否定，但对其发动者和领导者却给予肯定，怎么能说得上是“彻底否定”呢？另一方面，这个提法并不科学，“彻底否定”说的最大缺陷，就是忽略甚至摒除了参与文革的主体——千千万万的民众。波澜壮阔、怪象纷呈的文革运动，并不是几个跳梁小丑上演的一出闹剧；人民大众也没有完全被阴谋集团牵着鼻子走，他们同样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烈追求。以冷静的态度去观察文革，就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向往政治民主的热情决不亚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然而“暴民政治”等劣质传统又像梦魇般死死缠绕着这个民族，领袖更有利用民众热情达到翦除异己的意图，这一切在文革大动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文革史的研究之所以潜力深厚，就因为文革本身是一个多面体，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搅合在一起，才形成了那样一种光怪陆离的局面。仅从一个平面去观察，难免失之于肤浅。“文革中的群众性民主运动，一方面呈现了它的非理性和巨大的破坏性，另一面也展示了草根平民的抗争、正义、善良和创造性。它们才是文革运动最深层的原始动力。”陆文将文革的部分内容视作“中国民主政治的一次初步尝试”，虽然他的观点眼下未必能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但他提供的这一新的视角，将有助于人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思考。

陆文的优异之处在于，毅然跳出了权力斗争的窠臼，从世界民主运动的曲折

历程来反观文革史，其视野之宽阔，远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众专政，近至台湾岛上二十年来的民主变革，使人感受到饱受争议的文革史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陆文站在理性的高度，并没有将民主运动圣洁化，他指出，在东西方各国的民主进程中，都曾出现过混乱、残忍和丑恶的现象。中国的民主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简单地从外面引进来，而是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反复摸索，试验，受挫，再试验，再受挫，直至成熟。从这个意义上看，文革既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教训也是财富。以“彻底否定”来遮蔽文革真相，不仅割裂了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民主实践史，也对不起在动乱年代丧失了生命的许许多多同胞。

文革作为整体运动确实是失败了。然而陆文告诉我们，文革的部分内容，如“大字报”“大辩论”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仍在社会上继续“重演”。我们只要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就不能不承认他的判断是合乎事实的。陆文还特别提醒读者，要警惕权贵集团以“彻底否定文革”为由来压制民权，阻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面对近年来民权受压官权膨胀、社会不公愈演愈烈的现实，陆文的这种提示更如暮鼓晨钟发人警醒。